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1月31日第3期 总第247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47期

地方文革专辑（五）

【专稿】

周孜仁 云南文革史稿·卷一

阎红彦时代：从管涌到溃堤（1959年—1967年1月8日）

第一章 文革前传

一、循吏

二、阎红彦德政

三、饱受诟病的告密与小说《刘志丹》冤案

四、全国唯一公开宣称“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

五、“于、梁反党集团”

【评论】

石名岗 读《云南文革史稿》联想到的几个问题

【地方与军队】

余汝信 辽宁驻军的“三支两军”

【综述】

启之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概述（节录）

——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杜钧福 黑龙江省文革史资料补充

【读者来信】

1. 郭予庆：陆伟国文中之误 2. 蒋健：人大回忆录中有一处表述不妥

【资料】

2018年《记忆》1-34期总目录

【专稿】

云南文革史稿·卷一

阎红彦时代：从管涌¹到溃堤狂奔的仇恨与错位的篱笆

(1959年—1967年1月8日)

周孜仁

第一章 文革前传

一 循吏

按照中共中央文件定义，云南“新生红色政权”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是云南“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²因此，要说清云南文革，必需要先说清两位云南文革反派主角：阎红彦和赵健民；其次，文革肇端之时，阎红彦贵为封疆大吏，权倾三迤³，要说清云南文革为何应势而起，权力大坝如何从经年不休的管涌到文革一朝溃堤，必须从1959年阎红彦入滇主政说起。随着文革戏剧惨烈演进，稍后我们再说赵健民。

阎红彦，原名阎候雁，1909年10月26日生于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6岁造反起家，参加中共，与著名的陕北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一道成为西北工农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当时正值危机迭起、群枭争雄，需要英雄而盛产英雄的年代，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万里南来，如果不是历史赐予了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战争的特殊机遇，阎红彦和他战友们壮怀激烈和悲喜沉浮，最多不过是300年前他们的陕北老乡李自成、

¹ 水利学术语，指水坝坝身或坝基的土壤颗粒被渗流带走，对水坝形成一种渐进性的破坏。

²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128号文（1968年8月10日）。

³ 云南省习惯将滇地分为滇东北、滇南和滇西三部，俗称三迤。

张献忠故事的再版而已。幸运的是，上述所有的偶然成全了这个并不起眼的陕北后生。

阎红彦生得高大壮硕，共产党日益壮大的造反事业见证了他的成长历程：历任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红三十军军长、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任二野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入川，先后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川东军区副政委，四川体育委员会主任等职……1950年代末，他鬓有华发，已然“知天命”之年，政治品格和行为操守已铸练成型：第一、在英才辈出的官僚群体中，他能力相对平庸；其次，虽非干臣能吏，他决无政治野心；最后，他安于命道，与左右相处谦和。1959年巧遇庐山会议，他终得以封疆大吏之尊调赴边地云南，官拜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作为资深宦吏，阎红彦何以年近50方才修得正果？除了上面说过的缘由，还有一段历史公案必须加以说明。

同为陕北红军创始者，阎红彦与高岗素多不睦。1942年延安整风，已当上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到中央党校找阎，称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是子长（谢子长）、志丹（刘志丹）、你和我创建的”，他要阎为此说作证：一、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二、在临镇战斗中他临阵脱逃是被人绑架。没承想耿介直道的阎红彦偏不赏脸，怏称：“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清楚。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阎还反揭高的疮疤：“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按当时的纪律，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我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时，你回来了，队委会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了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当战士。”高岗恼羞而怒，连称“造谣、陷害”，大骂阎“有野心”而去。¹

延安整风时期，政治才干与官场手段远在高岗之上的高岗已深得高层赏识。1945年中共

¹ 李原：《阎红彦年谱简编》，《只唯实》页361。云南人民，2003，阎红彦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李原一直任阎的秘书组长。

召开七大，高岗不仅当选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代表，还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阎红彦坚认此议不妥，遂向刘少奇、任弼时等力呈异议，事情无果，反遭批评。两个月后，高岗不仅当了中央委员，且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阎愈益愤愤，再次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要求中央将他的意见记录存档。意气用事的阎竟然还当面将其状告中央之事面告高岗。二人再结梁子。

1945年7月，中央召开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高岗对阎实施反击，并由康生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其时，高岗颇为得意地向人炫耀：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

于是阎红彦被调离了。两个月后，他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任三纵副司令，当了邓小平部属、陈锡联¹搭档，从此脱离陕北的是是非非，亦远离了最高层领袖的视线。²

阎红彦重受重用又过了许多年。“七大”后，高岗地位节节攀升。1949年中共建政，高岗荣登共和国副主席大位，如果不是事有突变，他大有可能取代刘少奇，成为毛的接班人——1954年2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高岗成了“高饶反党集团”的头子，是年自杀身亡。其中蹊跷吊诡，此不赘诉。

与高岗大起大落相比，阎红彦的日子过得平淡无奇。他先是以行署主任和军区副政委的身份往来奔走于川东穷山恶水，默无声闻地组织土改、剿匪、征粮……那当儿，与阎同在四川、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赵键民，已主持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而一举成名（正是这个赵键民，在十多年后的文革中把云南闹了个天翻地覆）。如果不是高岗摊上大事，谁也不会注意阎红彦这个憨厚平实的陕北汉子。

高岗自杀次年9月，中共军队第一次授衔，早已从事地方工作的阎红彦，和乌兰夫、叶飞、周保中等中共历史上有特殊表征意义的老资格，一起破例被授予军衔，贵为上将。又三年，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一律衣着藏青色干部装的臣僚中又见

¹ 其时，陈锡联任三纵司令员

² 李原，页 361-362。

到这位大个子，抱歉道：“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阎当然知道，1942年他同高岗论争、1945年向中央状告高岗挨批，这回终得洗清反正。毛又道：“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阎立即大度而恭敬，谨答：“多少年前的事了，我没有什么意见。”那一年，他年49，重新回到毛泽东的视线之中。¹翌年8月17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被领袖一巴掌从云端打落。国防部长易人、总参谋长缺位，遂由公安部长罗瑞卿替补；公安部长缺位，则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替补；滇省书记缺了位，阎红彦遂调任了该省第一书记。

中国历来将官吏类分为循吏、能吏和佞臣。所谓循吏，司马迁的定义是：“奉职循理”。循吏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宽政得民安人和；他们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执政能力则相对不那么重要了。云南远离中心，经济文化落后，对全国大局影响甚微，中央对边地工作的唯一要求，就是稳定、稳定、还是稳定。执政官员只需老实、忠诚、肯干就行。阎红彦正符合这个条件。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用他的老上司陈锡联得话说，就是“老阎诚实、坦率、直来直去，不搞私心杂念的东西。”²上面所言“耿直刚强”“直来直去”，换一个说法，就是执拗、认死理，循规蹈矩却不懂机变圆通：在官场行走，这正是一大忌。后面我们还会看到，阎红彦之后第三任云南省委书记周兴，也属同一类色彩。客观地说，按正常规矩，由这类官员主政云南是适宜的，只是一遇纲纪崩毁，尤其是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浪就坏了，这类循吏注定手脚无措，左支右绌，落入灭顶之灾。

长期担任副职闲职，如今要以封疆大吏之身独当一面，阎红彦心有不实。初接任命，他找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说自己按“水平”和“性格”“怕难担此重任！”自认“党内斗争我总是失败者。”邓回答很痛快：“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怕’字！”邓要他“从实际出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么！”

¹ 李原，页 361-366。

² 陈锡联 1981 年访谈，李原，页 368。

除了对自我能力缺乏自信，还有一问题让阎忧心：前任谢富治主滇，政策一贯左倾，“大跃进”搞“一步登天”穷过渡，搞得民不聊生。如今庐山风暴未歇，彭德怀反“左”言论正遭狂批，会议要求全国持续“大跃进”，继续循此套路，焉能扭转南疆乾坤？阎红彦再找彭真求情，直截了当摊牌：“我和彭老总的看法是一样的，当前又主要是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在这个时候，要我去云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怕不合适吧！”彭真对阎的肚子疼心了然之，于是替他作切割：“他是他，你是你，那是两回事吆！作为领导干部，看到工作中的问题，说真话，讲实情，干实事，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¹

1959年9月，云南这块烫手山芋正式传到阎红彦手中。

二 阎红彦德政

中共入滇建政后，谢富治曾在此主政七年余²。初，执行“稳定、团结”方针施政，也创行不少功德，后来——尤其1957年后——该谢紧随领袖的冒进战车一路左奔，愈益出格。1959年入京后对领袖亦步亦趋，以至文革红极一时，权倾天下——其人虽侥幸于1972年离世，待到“四人帮”塌台，仍被重掌权柄的“老家伙”们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于1980年开除党籍，撤销《悼词》，骨灰从八宝山公墓移出。

谢富治左倾治滇，“大跃进”表现最为淋漓。官方资料记载：“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根据省委指示，先后4次向各地州市和一些县委发出创高产的通知。”省委指示，为了打破迷信，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必须创造大面积的丰产纪录和创造单位面积高额丰产纪录。单位面积产量的高产纪录“力求突破，哪怕一亩、两亩也好。”“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这对于打破迷信，鼓舞士气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经济上也有实际意义。”8月16日，云南省委给各地的电报中公开号召弄虚作假：“据了解各省很多地方搞高产产量‘卫星’田，都是用移苗并秧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来亩水稻‘卫星’，放出3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晚稻能否放5万斤以上争取10万斤的

¹ 李原，页377。

² 谢富治1953年由四川调云南接替宋仁穷任省委书记。

‘卫星’。”到了9月，眼见尚未弄出成效，4日，省委再次给红河、思茅、玉溪等地委追发电报，称：“我省早稻、中稻都没有放出千斤省的‘卫星’来，晚稻一定要设法放出千斤省的‘卫星’来。”10月17日又给产粮大县宜良、富民、澄江、江川、建水、元阳，大姚、邓川、大理下军令状：“省委指示9个县今年小春一定放出大面积‘卫星’。尤其是小麦‘卫星’。我们意见是小麦不少于1万斤以上……争取比一般早收一个月，赶在全国全省之前放出‘卫星’”10月21日，再给澄江、玉溪等10县委发电通知：“省委要求10县委保证明年放出小春‘卫星’。”¹

大跃进高压下超强的农业劳动和营养不良很快就出了问题。官方统计，从省委连篇累牍追放卫星指示的1958年6、7月始，浮肿病便开始在曲靖，玉溪、红河、楚雄、昭通、大理、丽江、文山、临沧、思茅等10个专州70多个县、市大面积爆发，死亡率畸高，截至8月20日止，全省发病人数已达236000多人，死亡34000人，占发病人数的14.4%；其中尤以曲靖、玉溪、红河等为最。曲靖地区至8月底累计发病141169人，死亡18909人，占发病人数的13.4%；玉溪地区至9月下旬累计发病52500人，死亡10062人，占发病人数的19.2%；红河州至9月上旬累计发病33249人，死亡3262人，占发病人数的9.8%。7月7日，云南省卫生厅派出省第一人民医院内科主任沈允斌等到死人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泸西县实地调查，认定此病系混合型营养不良性水肿，并向曲靖地委写了《泸西县肿病调查防治报告》。曲靖地委怕担责任，转发报告时称水肿病发病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此报告仅“供领导同志参考”。云南农村死人的事情进一步恶化。²

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1958年8月22日写给省委的报告《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继续痛呈凶信：茶花乡现有2434户，9510人。从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发病4081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户、1089人，死亡

¹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58年条目，北京：当代中国，1996。

² 同上，页189。

272人，死亡率为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11月20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18817.14亩，1957年产粮526.4796万斤，1958年产粮381.099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45.3799万斤。减产27.61%。1957年人均口粮336斤，还要扣除吃掉的萝卜（10斤萝卜折1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1958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人，后改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¹

事情闹到这一步，谢富治不能不心惧上峰降罪，遂于11月18日，以省委名义向中央上报了《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分析了所犯错误的根源，“主要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较为普遍，对群众的生活疾苦关心重视不够，加之在宁左勿右思想的指导下，不敢正视当时已经非常严峻的粮食问题，以致给全省人民造成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鉴于省委的失职错误严重，请求中央给予处分。”毛泽东从来喜欢属下书面检讨，因为一份检讨便是一份驭人利器。大跃进本是他头脑发热的病态冲动。谢的检讨自然让毛对他的左倾及忠诚之好感又添了一分。1958年11月25日，毛对中宣部《宣教动态》145期转发的此报告宽宏大量地作了题为《一个教训》的批示：

¹ 转引自《墓碑》第十章《大饥荒中的云南》。

“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依。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¹

前任此类荒诞作派，阎红彦早有耳闻且并不陌生，任职四川期间，他对“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便深恶痛绝。1958年秋，听说温江地区某公社水稻试验田亩产3万多斤，他曾专程前去查看，所谓高产“卫星”果然是将几十亩即将成熟的水稻移栽挤进一小块田地摆样作秀，党报《四川日报》所发消息则毫不脸红地宣称四川粮产几近翻番。为此，阎红彦憋不住在省委会议上怒批报纸“瞎吹”。²阎红彦向彭真坦言与彭德怀观点一致，其源盖出于此。云南作为边疆民族地区，谢富治施政不仅口号花样百出，实际结果，又比内地多一重灾难：1958年谢大反“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条件论”，大搞“三步并作一步走”，原来和谐有序的民族政策惨遭冲击，边疆动荡，边民13万多人非正常外流³……

“左”倾错误使云南省的经济、社会生活处于极为困难的状况。履新伊始，摆在阎红彦面前的数据是：1959年，农业生产总产值比上年下降5.89%，财政赤字8112万元；1960年，农业总产值继续下降4.01%，粮食下降3.51%，粮食大幅度减产，副食品严重缺乏，致使农村浮肿病患蔓延。截止1960年7月底，除临沧地区以外，全省浮肿病人已达7.9万多人，人口持续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⁴……

庐山会议刚落幕，批“右”风暴横扫全国，“三面红旗万万岁”口号响遏行云，事实却是所谓“总路线”“超英赶美”“钢铁翻番”“全民炼钢”已彻底失败。最要命的，是

¹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页201。

² 李原，页376。

³ 云南民族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时期。有的（如傣族）是典型的封建制度，有的（如佤族、基诺等）尚处于原始社会。解放之初，有的采取“和平协商土改”（称“和改区”）、有的搞直接过渡（称“直过区”等），保持了边疆总体社会平稳。1958年4月26日，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召开边疆“直接过渡”地区工作座谈会，肯定这类地区出现的“民主革命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作一步走”的激进做法。自此边民开始外流。

⁴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58年条目。

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公共食堂，弄得饿殍处处……这些都是必须马上解决的。阎红彦作为第一责任人，如果继续靠政治梦呓和左倾口号治滇，显然只会更糟。他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三农问题。来滇前阎面见邓小平、彭真，丑话已说在了前头。况且政敌高岗早已塌台，阎红彦成了陕北根据地旧果仅存的正确代表，有此“丹书铁卷”，按自己的主意大干一番，阎红彦底气足矣。

中国为官之道，对政事儿无非三种办法：一是不说做，一是只说不做，一是只做不说。不说做，尸位素餐，诚然安全无虞，但射灯永远照不到头上，难有升迁之机；只说不做者，只要巧舌如簧，又遇上司喜人吹拍，往往一路春风；在政治风险极高的极权环境下，只做不说，当属有理性又有社会担当的稀缺物了。阎红彦基本属于第三类。他懂得中共游戏规则，他知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是万万碰不得的，但就事论事地解决应急的事——首先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却刻不容缓，也是可以办的。来滇三月后的1960年2月至7月，阎红彦用整整半年时间，就安排群众生产生活为重点，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研究对策，他从滇中粮仓禄丰、建水、曲靖、玉溪、巍山……到边境穷乡勐海、孟连、澜沧、西盟、景洪等县，普遍听取了地县委汇报，同时直接向农民和基层干部进行探访。

大理三月，车过剑川县金华公社，著名电影《五朵金花》描写这儿“大跃进”的“好风光”曾感动过全国无数观众。阎红彦在此路遇的，偏偏是凄凄惨惨的送葬队伍，死者多为缺粮患浮肿病致死。阎红彦愤怒了，他当即找土官们查问为何知情不报？基层书记一个个噤若寒蝉，承认怕被扣“右倾”帽子，不敢说真话。阎随即召集省委常委开会，决定：一、对主要责任人州委、县委、公社书记进行组织处理；二、向全省灾民发放平均每人每天8两救济粮，对浮肿和妇科病人集中免费救治，全省共组织医务人员3万多人下乡工作；三、要求各地、州把制止肿病死人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4月10日、14日，阎又在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要注意安排群众的休息，做到劳逸结合；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把真实情况向上反映。4月17日，就金华公社大量肿病死人事件签发云南省委向中央、西南局的报告；6月，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

议，阎红彦专门主持研究让群众吃饱饭的问题，他再次强调：“不顾群众死活，胡吹，蛮干，不是马克思主义。”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大量肿病死人的蔓延和干群关系的恶化得到暂以遏制和缓解，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健康状况逐步得到恢复。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组织形式一大要件，是消灭家庭私有制、建立斯巴达式军事共产主义的重要生活方式。1960年底，在阎红彦主导下，云南省委明确决定：边疆地区一律不办公共食堂；而体现人民公社所谓“一大二公”的核算制度，也被云南省委进行了大幅调整：内地高山分散地区分别实行大队、生产队、作业组所有制，远离生产队的单家独户或三家再户，作为生产队的“挂钩户”，实行单独经营；生产队、作生组、个体户实行农作物、畜牧业、林业和副业的生产承包责任制……阎红彦动作之大，实属全国罕见。

还有边疆民族问题。大跃进以来，随着“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论断的提出，原来那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很快就被贬斥为“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而横遭挞伐¹，云南作为少数民族最多的边疆省，反“边疆特殊论”、反“民族落后论”、反“条件论”随之风靡一时。阎红彦针锋相对地提出：“‘反三论’的观点，不是没有常识，就是说假话”，那种“没有条件也要上”的观点，是“刀枪不入的主观主义”，“刮‘共产’风的办法，不能刮出社会主义来。”“不能光一天唱赞美歌，而置群众死活于不顾。”²来滇第三年的1961年1月20日，云南省委正式向中央、西南局报告，要求“全面审查以所有制为中心的边疆各项政策”，并组织工作团分赴边疆，决定根据“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把入社农户由1961年占总农户的90%调整到56%，退回到互助组和初级社的水平；允许社员长期保留自留地、零星果木、竹蓬、柴山、小鱼塘、分养牲畜；对缺乏劳力的个体农民，允许用合理工资雇用短工，或以畜力换人工；允许自由借贷和自由买卖。³12月5日，阎红彦对省边边疆民族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批示：“在边疆不要笼统地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

¹ 《人民日报》1980年7月15日，特约评论员：《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

² 李原，页376。

³ 李原，页382。

路的斗争。”¹

阎红彦的动作、言论的尺度之大，让基层干部心有悸怕，担心“允许一些人单干”会“一动百摇”，破坏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阎红彦态度却坚决执拗，他说，我们要做到“百摇不动”，该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允许单干的也要实事求是地允许单干。

阎红彦的许多言论，成了1960年代云南人的福音。到了文革，这些言论都成了“阎红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

“光讲政治，不管生产，生产抓不上去，政治就讲不好。着重点是生产。”²“所有制的过渡，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共产风’纠正起来困难，是由于我们的干部错误地认为，搞集体方向就是对的，搞集体比个体好，搞公有比私有好……但群众有很大的消极情绪。全党的同志必须下很大的决心，从理论上、实际上有个清醒的认识，才能纠正‘五风’”³“右倾是方向问题，‘左’倾也是方向问题。王明、李立三‘左’得很厉害，他们的方向也错了，我们有些干部认为各民族共同富裕是个方向，因此就大办公共食堂。他的愿望很好，但是愿望达不到，方向就错了。把明天的事拿到今天来办，是错误的。”⁴“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⁵……

除了上升到理论的语言，这个省委书记的许多指示简直就是婆婆妈妈大实话：“（边疆）现在还保持落后的状态，有的地方不会使牛；有的地区还是刀耕火种。”“不洗脸，发也不理，生活水平反映了文化水平。我老是挖苦我们批的有些部门的文件，总是提那么一大堆什么教育方针呀！边疆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阶级教育啊！……实际上是很不

¹ 刘明辉、赵增益：《崇高的品质 求实的精神》，《人民日报》1979年2月10日。

² 1960年4月27日视察巍山县的讲话。李原，页380。

³ 同上

⁴ 1960年7月23日对边疆工作发表的意见，同上，页381。

⁵ 同上，页377-383。

负责任的，讲了那么多空话。沧源¹有个地方，有些青年人，问他是哪国人，他都不知道，你教育了多少年，他们连是中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爱国主义？”“（工作队）要有教员、有医生、有会手工业技术的，工农商学兵都要有。工作队到哪里，就在那里教他们生产，教他们手艺，教他们生活，教他们文化，教他们由不理发到理发。”²

阎红彦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61年秋，云南农村情况已有显著好转。80%地区生产、生活情况 and 政治情况都比较好。小春作物产量已达历史最高水平。初见成效的喜悦和自信难以掩抑，1961年5月9日，阎红彦在调研途中忙不迭给毛泽东写信，就社队规模、公共食堂、工资制、山林管理、实物分配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的汇报，提出：一、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要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山区的公社有的可以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而且应该基本上以村寨为单位划分生产队。生产的组织上，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产到户。二、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普遍都很强烈。主要意见，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既然食堂是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还是根据自愿，由群众讨论决定，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意办的就不办。三、关于分配问题，各地群众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多数地区群众不主张实行部分供给制。四、耕牛、大牲畜归生产队所有，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五、山林应分级管理，并应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六、公社内部的集体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分配上是平均主义的，什么都按人头分，各地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自从“大跃进”纵横国中，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断祭起乌托邦理论宝典：“一大二公”、反“资产阶级法权”、消灭商品经济、取消八级工资制……阎红彦其所作为，无不忤逆这些宝贝命根儿。可是毛泽东竟然没发怒，反而对其大加抚慰，5月16日，毛主席对阎信做了如下批示：

¹ 沧源县系云南临沧专区一边疆县。

²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页335。

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以及五六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各同志，供参考。

毛之所以没有发怒，是他知道大跃进惹下大祸。这时候正需要有人替他擦屁股。阎红彦是个实在人，由这样的人洁臀，领袖放心。阎书记于是继续任性地干下去。

三 饱受诟病的告密与小说《刘志丹》冤案

1962年，整个社会出现了1956年以来再一次宽松局面。但毛泽东心情却并不舒畅，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公然挑战，说大跃进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甚至私下警告毛：“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清算给毛敲响了警钟。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却突然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大题目要与会者讨论。他集中炮轰农村出现的“单干风”，谈“光明”、“黑暗”的比例，尤其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让代表们一头雾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理论。

按照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经典说法，社会主义仅仅是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一个“过渡阶段”，毛泽东颠覆此一提法，宣布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此历史时期“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必须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有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被称为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亦来源于此。全会决定在城乡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了文革的预热。党内斗争再次拉开大幕。

在这次会议上，阎红彦意外爆冷。小说责任编辑、《工人日报》何家栋说法最有代表

性：（正是阎红彦的告密）“为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一枚重型炸弹，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在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新闻、电影、戏剧等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前奏。”¹事情经过如下：

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请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以歌颂这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于1959年夏完成第六稿，作品体裁由纪实体改为长篇小说，付梓之前，作者将稿样送各相关人士征求意见，阎红彦属于意见征求者之一。《刘志丹》源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旧事虚构，阎红彦自然要“对号入座”。从陕北当年造反，到延安整风、七大召开，阎红彦和高岗拧来拧去，早成一对老冤家，阎红彦想要争的，无非就是陕北根据地到底谁是正宗创始人。事情到了1958年，高岗因“反党集团”事早身坠地狱，毛泽东亦专门向阎道歉，说把他“冤枉了十多年”，事情至此不挺好吗？可阎红彦偏偏对这段历史恩怨不依不饶，认为小说还在抬高岗、贬老阎，简直就在翻案！坚决反对出版。让阎更不能忍受的是，待到他去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经开始发表小说部分章节：他的愤怒可想而知，立即致电全国总工会和团中央要求停止刊载。致电无果，干脆将事直告康生——这一卦拍灵了。康生如获至宝，当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一律禁发，接着致信杨尚昆，提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

阎红彦趁胜追击。9月3日，阎红彦亦致信杨尚昆，要求中央针对小说《刘志丹》引发的西北历史问题，召开一次专门座谈会。9月8日，阎在西南组再以小说《刘志丹》做文章，说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²，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话：“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登出，引起爆炸性轰动。

这次会议前的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曾向中央和毛泽东呈送长信（所谓“八万言

¹ 摘自《西北革命历史网站》/《理论园地》文：“何家栋：阎红彦、李原和小说《刘志丹》”。

² 事实是，1959年作者写出第三稿后，作者曾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审阅，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请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认为小说还没有写好，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不要写高岗。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作者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而阎红彦看到的，已经是第五稿了（参看方兴海著《小说《刘志丹》冤案始末》）。

书”），详述自己历史，请求中央全面审查，并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2日，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和中央，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本已让毛恼怒，以为是向党发起新进攻¹，遂决心利用本次大会实施反击。阎此举正好为批判“翻案风”送来一枚重磅炸弹。9月中旬开始，各组结合批彭，同时集中火力对小说《刘志丹》展开批判，并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继而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正讲话间，康生乘机递过一张字条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念了这张条子，接着发挥：“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为主任。²

整人的权柄一旦落如康生这类酷吏手上，谁都不会有好日子过。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被齐调北京“学习”，不少被诬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成员。《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以至中宣部亦未能幸免。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1965年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端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陕甘宁老区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该集团的“黑爪牙”。一部小说株连万人，实为史上罕见“文字狱”。

八届十中全会吹响了阶级斗争号角。自1962年秋冬始，“阶级斗争”成了全国各级共

¹ 《阎红彦告密与习仲勋遇难的历史追踪》《中华论坛网》。

²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095-1096。

产党组织执政的头号主题。次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杭州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从此开始。

阎红彦告密事件让他在八届十中全会赢了个大满贯，其客观效果，确为毛泽东将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提供了一枚重磅炸弹，酿成一场株连上万人的大冤狱，同时亦让他本人广遭诟病。文革后，他的大秘李原¹极欲为他辩诬，不但无济于事，反而越辩越黑。笔者以为，综观阎红彦性格逻辑和处世风格，对该告密事大可不必过度解读，看作陕北历史“山头”之间恩怨的继续，阎像个乡村怨妇携私复仇，也就可以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阎红彦政治上其实非常不清醒、非常不敏感，有时干脆就是个糊涂虫。

四 全国唯一公开宣称“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

八届十中全会9月27日落幕，云南省委即刻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会议从10月25日至11月29日，参会793人，涵盖了滇省地、县委书记和军队团以上干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足见对中央精神之重视。开幕前，西南局办公厅李辛夫专电云南省委秘书长梁浩，传达西南局有关介绍四川经验的指示，说：“从四川的经验看，要划清阶级界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透一点有好处。”其时阎红彦正在上海治病（他身材肥胖，血压高，每年都需去上海求诊²），梁浩随即向省长于一川作了汇报。

于一川，河北沧州南皮县人，自幼聪敏好学，博闻强记，品学兼优，19岁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共，自此走上革命道路。时任晋冀豫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曾如此赞誉：“一川是党的秀才，革命才子。”1950年代，宋任穷任云南省委书记，专门向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要来了两位学识和经验均属丰富的“秀才”能吏，

¹ 文革前曾任阎红彦秘书、云南文山地委书记，1975年后任云南省委秘书长，后调南开大学任党委书记。

² 1970年代笔者供职于云南省委办公厅，多有老省委同事说起阎红彦身材高大肥胖，每年都要去上海做吸脂手术，用云南土话说，就是“割板油”。

一曰岳肖侠，任云南粮仓曲靖地委书记¹；另一位，就是担任省委秘书长兼土改委员会主委的于一川。

按于的思想水准和政坛历练，他应该读懂毛泽东对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创新成果是何等看重的，只是久居边地，日近长安远，对中央极权下的服从意识略有淡薄；其次，于一川精明干练，仕途顺风，短短十余年，已官拜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难免自负刚愎；最后，此次他恰恰随阎红彦赴北戴河亲历盛会，记牢了毛泽东讲话，除了阶级斗争，还有“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指示，于是居然自作聪明地告诉梁浩秘书长：“四川那样提，我们不那样提。”两天后，于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事宜，明确肯定，云南的情况与四川不同，四川那样提，我们不那样提。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群众运动。要强调抓生产力，抓经营管理。²

阎红彦于会议开幕次日返滇，因小说事件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暴得大功，不不得意满满，回得昆明，立马又一头栽进振兴云南的经济幻梦之中。对于省长自以为是的观点，他真心赞赏，鼎力支持；同样，对于西南局那个李辛夫的电话提醒，他不以为然。

11月26日，于一川受省委委托作《会议总结报告》：“我省情况是这样：两条道路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这个时期的突出表现的‘单干风’并没有刮起来。也就是说，经过调整，执行政策，发展生产，农村中是正常的状况。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农村中从开展一次两条道路的斗争入手，通过这样一个政治运动来解决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而应该以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为中心，结合对农民进行正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达到巩固集体经济的目的。”于省长的总结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两天后会议闭幕，阎红彦作总结发言，对于的《会议总结报告》充分认可，明确认定：“一川同志作的总结，是经过省委讨论同意的。”接着代表省委提出“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的方针；要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增加产品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云云；同时强调要有干劲，又要实

¹ 岳在文革中属于“八二三”派的干部，云南揭批查中理当属于整肃对象。所幸宋任穷复职，任中央组织部长。又得早年河南老家朋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搭救，调河南任省委副书记，幸免于难。

² 卓人政：《云南社教运动中的一场政治风波》载《百年潮》2008年2期。

事求是，能搞多少算多少，不要再犯浮夸、弄虚作假的错误，云云。

根据这次扩大会议精神，12月21日，云南省委在批转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中再次宣布，云南没有刮起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的问题，因此“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主要的和首先的是通过重续贯彻执行政策，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实际问题，把群众的生产运动组织起来，从中结合进行思想教育、启发诱导、分清是非，提高觉悟，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积极性。”¹

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正如大旗升杆，高高飘扬。仅仅时隔两月，阎红彦就公然对着干，在全国发出了惟一一份公开宣布“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头文件，无异于掰龙鳞，捋虎须，吃了豹子胆。西南局一位常务书记见此文件，立即提出，这是明日张胆地违背中央精神，当即责令云南检查。对此，阎红彦竟然针锋相对发牢骚：“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云南急于要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温饱和稳定，“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飯，我就天天搞运动。”²

麻烦越惹越大。翌年5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专门讨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毛公开点名批评了阎红彦“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

这一回，倒是先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吓一大跳，会议尚未结束，他便提前回了四川，于5月10日至23日主持召开西南局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专门传达了毛泽东对云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的批评，责令阎红彦检讨，还要云南省委写出书面检查报告。李井泉斥责参会的于一川：“你们就是对待十中全会不严肃！”。于省长只得检讨。第一次不过关，西南局领导再次敲打，提醒问题严重性，要其继续检讨，于唯唯

¹ 《中共云南省委文汇编（一）》第142-147页，云南省档案馆存。

² 《合肥晚报》2002年12月23日文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

遵命——一直到会议结束，虽经多次检讨亦未得过关。西南局责令于一川“回去再写检讨”¹。

阎红彦没有参加西南局的会议²。他缺乏政客的厚脸皮。杭州会议被最高领导点名，高血压也发了，心脏病也发了，省委诸人劝他看病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家里的事我们会料理的。阎去上海看病前，为检查定下口径，说省委的做法“是符合云南省实际的，只是文件在文字处理上有不妥之处，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应该记取教训。”留下于一川全权代表省委去成都挨克。知识分子干部最喜欢表现自己对组织的忠诚。于一川表现忠诚的机会到了。

五 “于、梁反党集团”

于一川从西南局返回云南，立马召开云南省委第七次常委会和省委扩大工作会，检查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方面的错误。5月28日，受省委常委委托，于一川将七次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加以综合，在会议作《检查报告》称：省委“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认识上有模糊之处”，宣传部写的那个文件，是有错误的，把十中全会的精神，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冲淡了。

会议结束次日，彭真受中央委托特来云南处理此事；31日，所有在昆常委悉数到场，由于一川正式代表省委汇报。依旧是那一套自我批评：云南省委对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认识不够、对阶级斗争认识比较模糊、从概念上讲阶级斗争多、联系实际不够、抓生产多，对社会主义教育抓得不够、宣传部的那个文件是有错误的，与省委思想有关系……云云。彭真多次插话，宽宏大量地说，我看了你代表省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常委讨论，认识了问题，就行了”“你们还是要抓生产，现在抓生产也得突出。”于一川于是再表沉痛，说问题严重，还要继续按上级指示，向西南局、中央写检讨。中央大员自然更加宽厚，回答道“不必写检讨了”“我回去向毛主席报告”。

彭真离滇，6月2日，云南省委马上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学习贯彻彭真视察云南的

¹ 同上

² 李原，页194。

指示，会议再次印发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对照检查前一段云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5日，于一川继续代表省委检查，说省委在一些问题上认识有错误，依旧是“阶级斗争的旗帜不明显”，对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甚至估计错误，因此把社会主义教育的位置摆得不够重。西南局敲了我们一下，指出了省委宣传部写的那个文件的错误，最后一锤定音：“主要是省委负责”。会议顺利结束，以于一川所作检查为基调，正式形成云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检查报告》，20日呈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及西南局。云南省委官员们的态度委实真诚，委实沉痛，28日，西南局批复：“同意云南省委对过去一段工作的检查。”

事情至此，关于“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引发的风波，算是暂告结束。于一川殚精竭虑，左支右绌，屁股基本擦干净，可以松一口气了。只是，1963年后的中国，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已如大网垂天，所有人都难逃劫数。云南四季虽如春，云南省委企图按部就班工作已不可得，以至阎红彦不得不先借于一川的政治头颅来祭一回旗。

1964年10月，根据中央精神布置开展“反右倾”运动，在云南省委召开的书记处书记会议上，那个稀里糊涂的“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文件，作为重大政治事件旧话重提。这一回，文件的操刀手和擦屁股者于一川、梁浩在劫难逃：双双成了“反右倾”的主要对象。

10月21日至11月19日，云南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地、市委书记和省直有关部门的参会者被要求对于一川进行揭发批判。其间，省委常委还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对于一川进行“帮助”。于省长先后作了4次检查，承认这几年工作上犯了许多错误，主要错误是将近两年的时间不讲阶级斗争，或者讲了而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总之，这两年的时间，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反映出来。

云南省委于是形成了《关于于一川同志所犯错误初步情况的报告》呈报中央和西南局。时间是会议结束一月后的12月26日，《报告》指出：从1961年调整以来，于一川的“右倾观点是相当突出的”，特别是1963年5月西南局会议“批评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错误提法，他极力推卸责任”。次年1月下旬，云南省委布置全省“四清”运动，再次召开

专门会议继续批评于一川，阎红彦将于的“错误”系统归纳三大块：“阶级斗争的观念问题”“干部问题”和“经济问题”，阎红彦称：于一川的检讨把许多重大问题都那么轻描淡写，好似至多不过是一些认识问题、工作问题。“一川同志是不是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的问题？我认为，不是这么个问题。”“贯彻十中全会精神时，在我们省委宣传部的文件上出现了一个‘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的提法，这是一个错误。”“当然，当时全国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是四川提了，但是全国谁也没有提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我们云南提了。”“所以，一川对十中全会的态度问题，是反映了他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思想感情的，是阶级本能的反映。一川的基本思想是：对阶级斗争，反正不能提。”

阎红彦对于一川下此狠手，有他的私心——于一川太能干了，对人又和蔼，在干部中印象普遍良好。谢富治主滇时代，很多具体工作都由于一川担纲，谢调离云南，原本就推荐于一川接任，皆因李井泉从中作梗，得以让阎红彦成了封疆大吏。阎的陕北“土老财”作风与于一川的京城知识分子作风一幅鲜明对比，将于一川干掉，确可让阎书记六根清净。

一把手定调，批判继续升级。就在这次会议上，有人甚至危言耸听地揭发，说“于（一川）、梁（浩）集团”实际已成为地下省委，已经在反党。”“八届十中全会后，于一川害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主张农村工作主要是生产和经营管理问题，梁浩背着省委极力加以宣扬和执行。性质已上升至“反党集团”层次。

干部们的揭发批判已然狂涛巨澜，事情就顺水下滩了，许多庸俗的花边传闻也派上了用场。时任组织部长、同样精明干练的孙雨亭正意欲上位，为了搬开王静这块拦路石，告密说：于一川夫人王静，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本系于的大学同学，王有一表哥是二人的同学，时在交通部交通管理局任局长。三人在校关系皆不错，而王静与此表哥局长又有青梅竹马之谊。王每次赴京开会理要前去探望表哥，此事登上了省委“简报”遂成了：王静与表哥关系暧昧不清，于一川甚至瞅机会送夫人去北京幽会。还称王静虐待保姆，毒打时把保姆头发都抓掉了。四清简报称，于一川对阎红彦来滇主政心有不满，曾私下发牢骚，

说“什么红军？不过西北红军！”

接下来就是作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1965年2月20日，云南省委向中央及西南局报告，认为于一川犯“政治上右倾”等错误，定性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央及西南局则据此作出正式处理：撤销于一川的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昆明军区副政委、云南省军区政委及党委第一书记等所有职务，调河南省郑州柴油机厂任副厂长。

“反党集团”另一名主犯梁浩因“在修改省委宣传部代省委起草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时，按照于一川同志的意图，删去原件中‘以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主要依据’和‘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等重要语句”，加上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个错误的文件未经正式讨论，他就擅自发出。”再加上“梁浩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云南省委决定，给梁浩留党查看两年、工资由9级降为12级的处分。¹

这次机关“四清”牵连了多少人，现无法查阅到官方资料。笔者保留了云南大学炮兵团驻省委联络站《捣毁阎王殿》战斗队1967年1月16日的传单，上面载有如下人员落马：“张子斋（省人委秘书长）、吴鸿宾（机关事务管理局长）、郭庆基（省委农村工作部长）。玉溪、昭通地委整个班子，大理地委书记郑刚（省委委员）”民间还有什么“四大流氓”“四小流氓”之说，则更难稽考了。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至少李清祥是在这次“四清”运动中被打倒的。李此前在省林业厅森林防火大队任党委书记兼大队长，再前，则任大型企业昆阳磷矿党委书记，再前则为谢富治警卫员。文革中被造反派从劳改地解救，后来便在两派间呼风唤雨，演出许多荒唐剧，这些，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再说。

对于于一川、梁浩和他们的同事们，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造反年代，他们对理想的献身和信念追求是完全真诚的，我们又必须承认，当共产党成为执政者，在毛泽东这样的一代雄主之下当了大小诸侯，历史又要他们在陌生的政治生态中重新学习：在政策与良心之中工作，在迎合上意与守正存真之中选择。造反需要的是拼命和牺牲、执政需要的则是柔

¹ 参看卓人政：《云南社教运动中的一场政治风波》载《百年潮》2008年2期

韧、退让、妥协，平衡术和生存技巧（特别是自我保护技巧），甚至或真或假的服从与逢迎，而不是信念和是非感，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不排除背叛和出卖。于一川没有学会这个，他的积极奉献，收获的完全相反的结果。

1979年9月，云南省委开会研究，同意省委组织部、省纪委关于于一川的复查报告，并上报中央。中共中央于11月23日为于一川平反。同年12月，云南省委亦作出决定，撤销原来对梁浩的处理。事情已经过去14年。¹

阎红彦在制造“于梁反党集团”冤案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从追求正义的革命者到党国官僚，几十年来，对假革命之名而制造的不义和冤屈，应该看得太多，但是为了自保，他放弃了良知和正直，把明明和自己思想一致、行为与共的同事拉出来祭旗。这个政治上的糊涂虫和经济上的实干家，满以为如此一来便可一劳永逸。事实证明，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阎红彦主滇7年，确实对风行全国的某些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并取得让滇人赞誉的成就。从1959年走到1966年，可谓他人生的高峰时代。早在1964年，云南就实现了平均每人占有粮食780多斤，每户有大鞋畜2头，小牲畜（主要是猪）3.3头，工业、手工业和文教卫生也有很大发展。他还发豪言壮语，说如果注意用先进技术带动落后，因地制宜地来改变落后，云南的情况会改变得快一些。如果工作跟得上，等火车通了，昆明的蔬菜水果可以供应北京，水果可以比北京提前两个月上市。这样，云南可以贡献比较多一些的东西。²还计划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要部队、农场和所有机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都要吸收少数民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方面的人才，并且要列入工作计划。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阎红彦依旧地强调说，这个运动“主要是掀起生产高潮”，“运动搞得好不好，主要是看生产上、经营管理上、

¹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1965年卷。

² 1965年12月10日，阎红彦在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领导水平上是不是有显著的变化。”对边疆地区，他公然明确提出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

¹振兴云南的经济梦让这位封疆大吏沉迷得太深沉。

出于历史书写者的责任感，我们还必须指出，在经济工作方面，阎红彦的云南德政，充其量不过一典型中国农村殷实的小财东作派罢了，远远谈不上现代经济理念。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例1，1965年云南第一条通向内地的铁路：贵（阳）昆（明）线举行通车典礼，两省大员均已到场，却迟迟不见阎红彦身影，主持典礼的省计委主任郭超慌了，急忙让计委秘书长胡延观再去恭请。不料阎书记一盆“冷水”泼去：“铁路通了有什么好庆祝的？大跃进为什么云南饿死人少？交通不通嘛！中央调不走粮食嘛！”后来，计委准备调云南调油脂给上海，再从上海换回肥皂、牙膏，亦累遭阎书记一票否决，坚决不同意上海人赚云南的钱；例2，1965年，中央主持云贵川三省计委领导（四川为杨超、云南为郭超、贵州为贾启允）在四川邛海开会，以支援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为题，研究大三线建设。会上，大家都想方设法“抢”项目、“抢”资金。贵州把飞机基地（01基地）项目“抢”走了。云南永仁县宝鼎山的煤炭发储量大，品质好，本可“抢”一笔钱为“攀枝花”配套，不料阎书记的回答让郭超痛心疾首又哭笑不得。阎说，搞煤矿，人多了供不了饭。四川要，干脆就把宝鼎山划给攀枝花吧！四川杨超大感惊喜，于是得寸进尺，说永仁拉姑林业局年产木材20万方，也划给四川吧！阎亦当即认账。还有，中央考虑云南穷，决定趁配套大三线，在昭通安排8个精密仪器项目（与贵州的01基地配套），同时推动内（江）昆（明）铁路的建设。如此利好的事情，竟然也被阎红彦一口回绝（他担心外地来人向云南抢粮吃），让与会的郭超忍不住扼腕长叹！搞了一辈子经济工作的胡延观，几十年后谈起仍痛惜连连，说如果当初阎红彦接受了北京的恩施，听进了同僚专家们的意见，云南工业何至于至今还在全国末尾徘徊！

历史没有再给云南机会，因为，文化大革命马上开始了。🔴

¹ 李原，页398。

【评论】

读《云南文革史稿》联想到的几个问题

石名岗

周孜仁先生的《云南文革史稿》写得是相当精彩。作者对云南文革史烂熟于心，对历史的脉搏把握得非常准确。作者以云南文革三任半省委书记，即阎红彦、谭辅仁、周兴及贾启允（半任）为主线。将云南文革分为六个阶段，即阎红彦、军管、谭辅仁、周兴、贾启允及结束阶段。从宏观上对云南文革进行了高度概括，又在微观上或特殊性上对具体的重点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如云南干部的来龙去脉，八派（八二三派）和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崛起和分歧等，对每个重大事件进行了梳理。参考和引用的史料之多是文革史中比较少见的。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1. 关于革命对象的称呼问题

走资派、造反派等等，都属于文革时期的专有用语。有一些文革史把革命对象称为“官僚集团”、“军事官僚集团”。从“走资派”到“官僚集团”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变换，这关系到文革的性质。走资派与官僚集团不是一个概念。

官僚集团是特定的概念，美国学者彼得斯在《官僚政治》一书中，对官僚政治有比较严格的定义。它应该具备官僚制度和官僚结构两个条件，常与贵族政治相对而言。因此这是一个专制制度的产物，文革前真还没有形成这种制度。当然在任何制度下都可能产生官僚主义，但不是官僚政治。如果把官僚理解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意思，文革前的官员在主观上，没有把国有资产看作是自己的。在客观上，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官僚资本。不能把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是两回事。

走资派指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其实这些走资派也就是为了渡过经济困难时期，搞了一些“三自一包”之类的市场经济的“小伎俩”，离着资本主义还很远。相对于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来说，这些走资派的措施是进步的。

用文革结束四十年后，改开的某些政策偏差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某种官僚资本的经济结构，去对照建国十七年的社会状况与经济结构，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这种看法在理论上应该是源于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这种理论也许适合于当时半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却不一定适合当时阶级斗争非常激烈、不断向乌托邦前进的农民中国。由此，如果把走资派和官僚相混淆，或者相替换，显然混淆了文革的本质。

2. 关于“三足鼎立”问题

近几年，有学者提出文革是三足鼎立——军队、官僚集团及造反派三种势力对峙。云南史稿中引用了这种说法。这是不准确的。文革从开始就是上层之间的斗争，即所谓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由此才有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上层是下层斗争的领导，下层是上层斗争的基础。造反派单独与“资反路线”对立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此后就成了中央文革的雇佣军。在整个文革中造反派（或保守派）是军队或干部的群众基础，即下层。而干部或军队属于路线或利益的代表，属于上层。无论从路线讲，还是从集团利益讲，文革都是两派对立，而非三足鼎立。

造反派（或保守派）被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合分出来，是在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的时候。“造反”起家的他们，无论是文革中拥护或反对“四人帮”的，都受到“复辟”的走资派的一致排斥。

3. 关于衡量标准

叙述文革应该有一个对事件的衡量标准。如在《史稿》中，称造反派发起“八二三”事件是“梦魇”，称阎红彦为首的干部是“官僚”，以贬损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是一种既想否定文革，又想否定官僚资本矛盾心理的体现。

“八二三”事件似乎是对资反路线的反弹，而资反路线是压制右派学生给党委提意见的手段，梦魇的源头应该是省委派工作组压制民主，不管民主是谁提倡的，不能改变言论自由的本质（虽然这种自由是有限的）。阎红彦等在六十年代初实行了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救活了云南百姓，称之为官僚是否合适？

文革是很复杂的历史活动，不能将其简单化，对于文革的每个事件，应该具体分析。

历史不能把好人和坏人概念化，这是因为：

其一，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

其二，好坏本不是固定的，好人可能变坏人，坏人也可能变好人；

其三，好人也可能做坏事，坏人也可能做好事；


其四，不可能一个阶级或阶层或集团都是好人或坏人。

好坏相互转化的例子很多，如果以阶级来划分好坏，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就是分裂人类的学说，说到底就是人类还没有脱离达尔文主义的动物界的表现。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人类才真正进化到“人”，民主实际上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和平解决的方法。

4. 关于派性问题

对于文革中的派性，包括赞同普世价值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嗤之以鼻，认为派性是文革的万恶之源之一。陈独秀、毛泽东都说过类似于这样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不过他们没有真正实践自己所说的话。毋庸置疑，派性是个性的延展，是民主的基础。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有了派性的不同观点和争论，才能保持政党和社会的进步。

文革中的派性，来自文革中有限的“结社自由”。人们敢于表达“派”的思想，维护自己“派”的利益，无疑是一大进步。如在山西，有一派敢于“反大寨”，无疑是对一统思想的抵制。所以说文革中的派性斗争，既是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又是两条路线的争斗。也说明所谓“为毛主席而战”的说法是一种假象（当时喊这种口号的人自己也未必认识到这种假象）。

怎样对待派性，民主和集权有着不同的做法。民主承认派性的合法性，并用民主的方法来检验派性是否有利于多数人，并少数派以保护。集权不承认派性的合法性，使派性的双方成为势不两立的状态，使得少数派的政治安全性得不到保障。文革中派仗打得昏天黑地、你死我活，盖源于此。结论应该是：派性无罪，集权有过。

【地方与军队】

辽宁驻军的“三支两军”

余汝信

一 辽宁驻军简况

1968年1月，辽宁省内军以上单位（不包括军事院校）数量与广东省同，为15个，即沈阳军区，沈阳军区空军，旅大警备区及所属外长山要塞区，陆军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六十四军，辽宁省军区，海军旅顺基地，空军第二、第三军，国防科委第二十三基地，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

（一）沈阳军区

领导和指挥东北黑、吉、辽三省境内所属武装力量，时为陆、空军兵力最多的军区。领率机关驻沈阳市。司令员陈锡联，政委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兼（1968年6月免），第二政委曾绍山，政委潘复生（1967年5月任），副司令员刘转连、唐子安，参谋长江拥辉，政治部主任李伯秋。¹

（二）沈阳军区空军

领率机关驻沈阳市。辖空一军、空二军及空三军。司令员曾国华，副司令员何振亚、吕黎平（1968年1月免），副政委程明，参谋长王毓淮，政治部主任王文。²

（三）旅大警备区

兵团级单位，领率机关驻旅大市。代号3280部队。司令员邓岳，政委杨俊生，副司令员陈信忠，副政委袁佩爵，参谋长程登志，政治部主任缺。³辖外长山要塞区，守备第一师（代号3220部队）、守备第二师（代号3292部队）及守备第三师（代号3042部队）。

旅大警备区军史称，“1967年1月警备区介入地方文革后，派出干部五百五十六人、

¹ 陈锡联，1955年授衔上将。曾绍山、刘转连，1955年授衔中将。唐子安、江拥辉、李伯秋，1955年授衔少将。

² 曾国华，1955年授衔空军中将。何振亚，1955年授衔空军少将。吕黎平、程明、王文，1961年晋升空军少将。王毓淮，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

³ 邓岳、杨俊生、陈信忠、袁佩爵，1955年授衔少将。程登志，1961年晋升少将。

战士一千零三十六人，共一千五百九十二人，约十个连的兵力。先后对广播电台、冷冻库、油库、粮库（一月二十三日）、监狱（二月三日）、公安局（三月七日），……市党政机关（三月三十一日），机车厂（六月二十九日）等国家重要目标、要害部门实行了军管。”

“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驻旅大陆、海、空三军（旅大警备区、海军旅顺基地、空三军、炮七、三十一师），对旅大市实行了全面军事管制。”“成立了‘大连警备司令部’，狠抓了制止武斗的工作，那里发生武斗，执勤部队就到那里制止。”“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了支持新的政权。警备区先后派出一千七百五十五名干部、战士，参加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其中办事人员五百二十八人）。参加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军队代表，邓岳任主任，……要塞区、各师、团都派主要领导干部参加各区、县、工厂、企业、学校的‘三结合’。”¹

（四）外长山要塞区

隶属旅大警备区领导，执行军级权限。领率机关驻长海县，代号 3282 部队。司令员王海廷，政委任茂如，副司令员黄国忠、陈武魁、姚路，副政委杨国喜、牛明轩、尹培良，参谋长赵勤谋，政治部主任王国英。²辖广鹿、小长山、大长山、石城、海洋、獐子等 6 个守备区。

（五）陆军第三十九军

领率机关驻营口县，代号 3096 部队。军长张峰，政委陈绍昆，副军长王扶之、朱恒兴、高克，副政委何渠若、李军、封克达，参谋长要清川，政治部主任王君森。³辖陆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一六师、第一一七师。第一一五师师部位盖县，代号 3097 部队。师长赵先顺，政委韩守一，副师长楚永兴、刘纯仁，参谋长何海云，政治部主任汤文惠。第一一六师师部位海城县，代号 3174 部队，师长张杰，政委李兆书，副师长王林，副政委胡可风，参谋长萧文泉，政治部主任张业香。第一一七师师部位复县，代号 3125 部队。师长王秀法，

¹ 旅大警备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军史》，1989年3月，页131-134。

² 王海廷、任茂如，1964年晋升少将。黄国忠、陈武魁、姚路、杨国喜、牛明轩，1965年大校军衔。

³ 张峰、陈绍昆、王扶之，1964年晋升少将。何渠若，1960年晋升大校。

政委薛瑞云，副师长刘兆，副政委王青羊，参谋长黄达宣，政治部主任张跃东。

该军军史称，1967年2月2日，“我军进驻鞍山、营口、海城、复县、新金、盖县、盘锦等地，执行‘三支两军’任务。”8月17日，“根据中央《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由军长张峰、政委陈绍昆为首的军管会，对鞍山市实行军管。”¹1968年，“我们军‘三支两军’地区的各市、县、区先后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共有900多名干部战士被结合进各级的革命委员会任职，继续进行‘三支两军’工作。”²

（六）陆军第四十军

领率机关驻锦州市，代号3135部队。军长吴忠，政委刘振华，副军长颜文斌、符必玖、黄德懋，副政委张纪之、展明，参谋长宋宪孔，政治部主任郑屏年。³辖陆军第一一八师、第一一九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一八师师部位义县，代号3136部队。师长赵兴元，政委谭顺田，副师长翟文清，副政委张仲先、李湖，参谋长于宗浚，政治部主任朱英才。第一一九师师部位锦县，代号3146部队。师长朱玉荣，政委王世乾，副师长张建奎、刘忠武，副政委李洪奎、苏章，参谋长杨月山，政治部主任郭俊。第一二〇师师部位兴城县，代号3160部队。师长邢维邦，政委冯恺，副师长宋汉珠，副政委李学毅，参谋长董长杰，政治部主任晏世禄。

该军军史称，1967年1月，该军“从二十五日起，介入了锦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先后派出七百四十五名干部战士，接管了锦州广播电台，和对锦州地区的粮、棉、油及物资仓库等四十二个单位，实行了武装警卫。二月下旬，派出八十八个连队进驻锦州、朝阳地区的十个县、二百七十六个公社进行支农。三月初，派出一千一百多名干部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锦州、阜新两市的一百七十九个工厂、五个矿区进行支工。并先后对阜新市、锦州铁路局和锦州地区等三十九个国家重要单位、部门，实行了军事管制。还分期分批对阜新市、锦州地区的大中院校和小学高年级实行了军政训练。”1968年“四、五月，

¹ 军史编写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征求意见稿）》下，1989年9月10日，页740。

² 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1995年5月，页771。

³ 吴忠，1955年授衔少将。刘振华、颜文斌，1964年晋升少将。张纪之，1955年授衔大校。展明，1960年晋升大校。黄德懋，1962年晋升大校。符必玖，1965年大校军衔。

阜新市、锦州市、锦州铁路局等单位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我们军有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结合进各级革委会，一百八十名同志担任了县团级以上革委会的主要领导。”¹

（七）陆军第六十四军

领率机关驻本溪县，代号 3225 部队。军长刘德才，政委郭玉峰，副军长张怀瑞，副政委马瑛、刘路明，参谋长缺，政治部主任展征。² 辖陆军第一九〇师、第一九一师、第一九二师。第一九〇师师部位本溪县，代号 3226 部队。师长王庆瑛，政委刘鸿臣，副师长汪明德、穆大法，副政委张千，参谋长刘振山，政治部主任缺。第一九一师师部位丹东市，代号 3249 部队。师长刘东起，政委武峰光，副师长葛根元、彭庆德，副政委马海臣，参谋长缺，政治部主任孙福斌。第一九三师师部位凤城县，代号 3271 部队。师长王统，政委李炜，副师长徐超、袁天禄，副政委段吉正，参谋长王连清，政治部主任边振武。

该军军史称，“1967 年初，……我军先后派出 3.2 万多人，分别到本溪、抚顺、沈阳、丹东 4 市和本溪、抚顺、凤城、宽甸、桓仁、清源、新宾等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7 年 3 月至 1968 年 12 月，根据党中央和军区指示，我军派出 22 个建制连队、270 名干部对沈阳、本溪市公安局和抚顺、本溪矿务局以及本溪钢铁公司、通化铁路局等 11 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建立了 6 个军事管制委员会，41 个军管领导小组。还派出近 200 名干部、战士对丹东铁路大桥、档案馆、凤城粮库，本溪、抚顺公安局看守所 5 个单位实行警卫保护。”“1968 年，……我军有 1792 名干部被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任职，部分干部还担任‘革委会’主要领导。军胡金波副政委担任了本溪市‘革委会’主任，张怀瑞副军长、武峰光副政委先后担任了抚顺市‘革委会’主任。”³

（八）辽宁省军区

领率机关驻沈阳市。司令员贺庆积，第三政委杨弃，第四政委李道之，副司令员张海棠、张天恕、赵鹤亭、巫金锋、汪应中、曾长柏、李亚田、凌少农、罗春云，副政委刘采

¹ 陆军第四十军编印：《光辉的战斗历程》，1978 年 12 月，页 380-382。

² 刘德才、郭玉峰，1964 年晋升少将。刘路明，1960 年晋升大校。张怀瑞，1961 年晋升大校。马瑛，1964 年晋升大校。

³ 陆军第六十四集团军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军史》，1997 年 7 月，页 465-467。胡金波任本溪市革委会主任时军内职务为军政治部副主任。

芹，参谋长刘春芳，政治部主任陶明。¹ 辖沈阳市、鞍山市、营口市、锦州市人民武装部，辽南、旅大、丹东、抚顺、沈阳、阜新、朝阳、本溪、锦州军分区。并辖辽宁省军区独立师第一师（代号 3209 部队）、独立第二师（代号 3365 部队）。

辽宁省军区组织史资料称，自 1967 年 1 月至 1973 年，“省军区共派出 13,969 名干部、战士（其中干部 7,582 人次，师以上干部 108 人次）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其中有 2,017 人担任省、市（地）、县（区）及基层单位的领导职务。”“按沈阳军区党委指示，省军区党委主要领导参加了临时组建的辽宁省‘抓革命、促生产’总指挥部，工农、文教、卫生等口都有一名省军区领导参加。……1967 年至 1968 年，按沈阳军区党委的指示，省军区成立制止武斗领导小组，每天有 2 至 3 个连队担任值勤，在制止武斗中有 459 名干部、战士被打伤（重伤 62 人），2 人被打死，共收缴武器 2 万多件，手榴弹 5 万多枚，雷管 23 万多个，子弹 20 余发，军用汽车 100 多辆。”²

（九）空军第二军

领率机关驻丹东市，代号 7321 部队。军长邹炎，政委赵其林，副军长张子安、李飞、孙景华，副政委缺，参谋长李飞兼，政治部主任王恕年。³1967 年 6 月后，全面负责丹东地区“三支两军”工作，有 45.8% 的干部先后参加了“三支两军”，78 名团以上干部参加了地方“三结合”的领导班子。⁴

（十）空军第三军

领率机关驻旅大市，代号 7331 部队。军长吕茂堂，政委杨大伦，副军长刘国柱、黄鲁、李兆霖，副政委任球，参谋长佟铁夫，政治部主任彤剑。⁵1967 年到 1973 年间，军组织机关、部分人员执行了北京市朝阳区和大连市区、局、院校、工厂的“三支两军”任务。⁶

¹ 贺庆积、李道之、张海棠，1955 年授衔少将。杨弃、张天恕、赵鹤亭、巫金锋，1964 年晋升少将。汪应中、罗春云，1955 年授衔大校。曾长柏、凌少农、刘采芹，1960 年晋升大校。李亚田，1962 年晋升大校。

² 辽宁省军区政治部：《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军区组织史资料（合编本）》，1994 年 12 月，页 282-283。

³ 赵其林，1955 年授衔空军大校。张子安，1960 年晋升空军大校。

⁴ 空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 2 集，北京：蓝天出版社，1992 年 10 版，页 63。

⁵ 刘国柱，1961 年晋升空军少将。杨大伦，1955 年授衔空军大校。吕茂堂、任球，1960 年晋升空军大校。

⁶ 空军政治部：《中国共产党空军组织史资料丛书》第 2 集，页 97。

（十一）海军旅顺基地

领率机关驻旅大市，代号 4005 部队。司令员马忠全，政委宋景华，副司令员高诗荣、赵友夫、冯尚贤，副政委孙鸿志，参谋长王屏寿，政治部主任冯达。¹参与了旅大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十二）国防科委第二十三基地

领率机关驻锦西县，代号 4497 部队。司令员郑国仲，政委王大华，副司令员杨国宇、冰野，副政委史子才、朱卿云，参谋长王际鲁，政治部主任陶绍侃。²

据基地《大事记》称：1967 年，“基地派出 1,030 名干部、战士(其中团以上干部 59 名，一般干部 861 名，学员和战士 110 名)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三月二日分赴锦西县 23 个公社和一个镇，担任支农任务。同时还派出 65 人组成 4 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进行流动宣传演出。同时，按上级部署，基地先后向锦西、北京等地派出 5,284 人次(其中去北京为 121 人次)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派到锦西地区的单位是：锦西县、石油五厂、化工厂、化工机械厂、化工研究院、化工二处、渤海造船厂、六局一公司等。派到北京的单位是：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及其所属第三研究院、北京市外贸局、冶金局、二商局等。派出人员中，有军职干部 7 人次，师职干部 32 人次。锦西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由基地、海军第一航空学校、四十军三五八团、锦西县人民武装部 4 个驻军单位，于一九六七年三月组成锦西卫戍区，后改为警备区，实施统一领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根据沈阳军区转发军委的指示，撤销了警备区，改设驻军‘三支两军办公室’，简称‘支左办公室’。”

（十三）沈阳军区炮兵

领率机关驻沈阳市。第一副司令员吴子杰，政委缺，副司令员王亚夫、艾福林、甘伯勋、熊金波、甄秉信，副政委：张兆仁、何瑾，参谋长甄秉信兼政治部主任缺。

¹ 马忠全、宋景华，1955 年授衔海军少将。高诗荣、赵友夫、冯尚贤，1955 年授衔海军大校。孙鸿志，1955 年授衔大校。

² 郑国仲，1955 年授衔海军少将。王大华、杨国宇，1961 年晋升海军少将。冰野，1955 年授衔大校。史子才，1960 年晋升海军大校。朱卿云，1960 年晋升大校。

¹辖炮兵第七师、第十师、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三师，高炮第六十二师，军区野战高射炮兵群。

（十四）沈阳军区装甲兵

领率机关驻沈阳市。司令员缺，政委杨中行，副司令员唐青山、王超、赵占魁、赵云鹤，副政委裴光、高书简，参谋长吕文选，政治部主任王千祥。²辖坦克第三师（代号 3289 部队）。

（十五）沈阳军区工程兵

领率机关驻沈阳市。主任夏克，政委王从周，副主任杨启轩、宋文洪，副政委邹平光，参谋长朱玉山，政治部主任苏民。³辖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工区及工程兵第四支队（代号 3316 部队，1968 年 2 月组建）。

二 1967-1968 年辽宁文革进程与军队

1967 年 1 月 31 日，由 24 个造反组织发起成立的“辽宁省革命造反夺权指挥部”于凌晨三点宣布接管辽宁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辽宁夺权未有得到中央承认。

2 月 16 日，“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在沈阳宣告成立，宋任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以示支持。“辽联”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学生造反派为主体，思想较为活跃，得到了相当大一部分机关中下层干部和已经“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辽联”反对沈阳军区 1966 年下半年后对军内造反派和 1967 年 1 月介入地方文革后对地方造反派的压制。

2 月 20 日，辽宁省军区对辽宁省公安厅实行军事管制，沈阳军分区对沈阳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邮电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¹ 吴子杰，1955 年授衔少将。张兆仁，1955 年授衔大校。王亚夫、艾福林，1960 年晋升大校。

² 杨中行、唐青山，1955 年授衔少将。王超、裴光，1960 年晋升大校。赵占魁，1962 年晋升大校。

³ 杨启轩、宋文洪，1955 年授衔大校。王从周，1960 年晋升大校。

2月27日至3月1日，辽宁省军区召开部队和地方三级干部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农村备耕和春耕生产工作。

3月19日，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进驻各地机关、报社、电台、学校、工厂、农村，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4月21日，东北局书记处发表“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点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最近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的“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是保守组织；2、他们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是违反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的通知的，是非常错误的，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通知精神撤出；3、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三点意见”引起了冲击东北局的较保守一派学生组织的强烈不满。5月4日，这一派组织在沈阳市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批判“三点意见”，会场上与保宋任穷的“辽联”派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5月10日，冲东北局一派在沈阳南站前广场召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成立誓师大会，声讨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矛头直指“宋、马、顾、喻、徐”（指当时尚未打倒而又与“辽联”观点一致、受到“辽联”支持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三书记马明方、书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喻屏和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

6月5日，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主体的辽宁“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三一”）成立。至此，辽宁地区三大派三足鼎立、相互抗衡的局面形成。三派观点鲜明：“辽革站”——保陈打宋；“辽联”——保宋打陈；“八三一”——既打宋，又打陈。一般认为，“辽革站”是保守派，“辽联”与“八三一”是造反派，不过，“辽联”是造反派中较稳健一翼，而“八三一”是造反派中更激进一翼。

“三点意见”使本应长于政治斗争手腕的宋任穷本人及其为首的东北局书记处事与愿违，陷于被动。虽然，宋于7月4日被迫以他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但已于事无

补。8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领导的决定》，《决定》标志着毛、周在权衡利害后最终放弃了保宋，从此，辽宁全省为年初已介入“三支两军”的沈阳军区所左右。

8月26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沈阳三派组织赴京代表，并指示要制止武斗，恢复交通，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秩序。9月9日，中央领导第三次接见辽宁代表和军区、地方领导干部，解决实现大联合问题。在周恩来主持下，沈阳三派代表签订了《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协议书》。为加速解决辽宁问题，中央又派出以柴成文¹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到辽宁。12月18日，沈阳三派代表在中央调查组的主持下，与警备司令部代表达成《关于制止武斗联合紧急通知书》的协议。

1968年1月27日，辽宁三派群众组织，在京签订《沈阳三大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30日，在市人民广场召开“三大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大会”。2月13日，沈阳财贸系统200多个单位实现了大联合。20日，沈阳市大专院校三派签订了《革命大联合协议》。2月末，省委机关三派组织签订了《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议书》。到4月末，全省已有90%以上单位实现了大联合。

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决定省革委会主任由陈锡联担任。在省革委会委员中，军队干部占16%，地方干部代表占22%，三派群众组织代表占62%，虽然在人员构成上表面是“军干群”三结合且军队干部最少而群众组织代表最多，但实际上是军队干部主持了大局。

三 各地、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与军队

1968年初，辽宁省辖4专区，10省辖市，1垦区。各专区（垦区）、市革委会成立经过及与军队关系简况如下。

（一）鞍山市

¹ 柴成文，时任总参二部副部长，1961年晋升少将。

1967年4月9日，鞍山两派在游行时发生武斗。从本日至9月13日，发生武斗147次，有614人受伤，其中重伤116人。7月26日，鞍山两派代表在北京经两个月谈判，达成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十二条协议后，于本日返鞍山，但武斗尚时有发生。¹8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将原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等定为走资派，决定成立以张峰、陈绍昆为首的鞍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在军管会下设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分别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财贸工作。1968年3月22日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张峰任主任，何渠若任第一副主任。

（二）锦州专区

1968年4月3日，锦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锦州军分区司令员曾广珍任主任。12月26日，辽宁省革委会决定撤销锦州专区，将其所属的七个县划归锦州市领导。

（三）阜新市

1967年1月，阜新市形成两派，斗争日趋尖锐。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1月，市内发生较为严重的“打砸抢”事件27起，波及朝阳、哲里木盟地区的25个单位。2月28日，阜新地区实行军事管制，阜新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展明。1968年1月28日，阜新市两派在北京达成大联合协议。2月24日成立“阜新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4月26日，举行阜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暨庆祝大会。阜新市革委会主任为展明。²

（四）朝阳专区

1967年1月28日，由一派群众组织成立的“朝阳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宣布夺了中共朝阳地委、朝阳专员公署的党政财文大权。1月29日，另一派群众组织成立的“朝阳各界总部”极力反对“朝阳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一二八”夺权，称他们为“保皇派”。2月26日，朝阳军分区公开表态支持“朝阳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承认“一二八”夺权，并由朝阳军分区负责人、地方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组织负责人正式组成三结合

¹ 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鞍山四十年》，1989年9月版，页518-519。

² 阜新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阜新市志》第一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页63-64。展明，时任陆军第四十军副政委。

的领导机构——朝阳地区临时革委会。3月2日朝阳地区临时革命委员会开始办公，启用新公章。1968年5月6日沈阳军区批准成立“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贺晓成任主任。¹

（五）沈阳专区

1967年3月5日，沈阳军分区支援农业生产领导小组成立，军分区政委赵克勋任组长。27日，专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指挥赵克勋。6月18日，地委第一书记申东黎被迫害致死。26日，沈阳军分区司令员苟耀德任专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总指挥。是月，全区开始出现武斗。8月武斗升级。1968年2月12日，解放军辽宁省沈阳专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原公、检、法机关人员大部分进“五七干校”学习。5月7日，沈阳军区批示，同意沈阳军分区《关于成立沈阳专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苟耀德任专区革委会主任。12月26日，沈阳专区改名为铁岭专区。²

（六）沈阳市

1967年1月23日，沈阳市委由市委机关“串连总部”、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18个群众组织组成的“接管委员会”接管，从此，沈阳市党政机关陷入瘫痪。2月22日，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陆续派员进驻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实行“三支两军”。8月16日，沈阳三派与沈阳卫戍区司令部签订《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12月18日，沈阳三派代表与警备区司令部代表，在中央调查团的主持下，达成《关于制止武斗联合紧急通知书》。1968年1月6日，沈阳三派与沈阳卫戍区达成贯彻1968年春季征兵命令的协议和《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30日，沈阳三派在市人民广场联合召开“沈阳市三大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大会”。5月10日，沈阳市革命委员会与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市革委会主任为王从周。³

（七）锦州市

¹ 朝阳市史志办公室：《朝阳市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页81。贺晓成，时任朝阳军分区第二政委。

² 铁岭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铁岭市志》综合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7月版，页69-70。

³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沈阳市志》第一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年6月版，页176-178。王从周，时任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

1967年1月10日，锦州市造反派开始夺权，各级党政机关逐渐瘫痪。是月，驻锦部队奉命在锦州开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2月，锦州市形成“好”“糟”两大派。3月6日，锦州市公安局发出通令，宣布锦州师范学院等几个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5月27日，市公安局军管会撤销“三六通令”。8月，锦州市武斗再次升级，许多工厂停工。1968年1月10日，解放军锦州警备区发出布告：奉命自即日起，对锦州地区公检法机关全面实行军事管制。2月25日，锦州两派在站前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锦州市大联合委员会（8月11日两派群众组织宣告撤销）。5月26日，锦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¹陆军第四十军副军长黄德懋任主任。1969年1月10日，辽宁省革委会决定，锦州专区与锦州市合并后组成的锦州市革委会，仍由黄德懋任主任。

（八）丹东市

1967年2月，丹东驻军介入地方文革，表态支持“丹联”派夺权革命行动，全市夺权之风骤起。2月13日，丹东“红司”派认为丹东驻军某些支左人员支一派压一派，“红司”派组织到山上3197部队军部门前送大字报，并在门前围坐长达7天8夜，即“二一三事件”。3月中旬，以军队领导为主体组成“丹东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5月底，3197部队因换防离开丹东，丹东支左工作改由空军某部负责。1968年1月8日，丹东市驻军对丹东市公安局、检察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并称解放军丹东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2月19日，丹东市两派群众组织举行实现革命大联合大会，成立丹东市革命大联合指挥部。5月30日，丹东市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宣读辽宁省革委会关于成立丹东市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中同意赵其林任市革委会主任。²

（九）营口市

1967年1月28日，以营口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为首的6个学生、工人造反组织，于夜间夺了营口市党政财文大权，抢走了公章，此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

¹ 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锦州市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9月版，页

² 丹东市地方志办公室：《丹东市志》（1），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4月版，页176-180。3197部队为陆军第五十军代号，空军某部指空军第二军，赵其林时任空二军政委。

业单位大多被造反派夺权。是月，营口驻军某部及辽南军分区、营口市人民武装部派出大批干部、战士，进驻全市各有关单位。3月14日，营口市按照“三结合”方针，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7月，营口市各不同派别的造反组织间武斗不断发生和发展。据城区六、七月统计，共发生武斗75起，伤135人。12月21日，营口市公安局、检察院、中级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成立解放军营口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8年1月，营口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开始联合。双方代表在北京办学习班谈判时，在周恩来主持下，两派联合成立营口市革命群众大联合指挥部。5月31日，营口市革委会成立。主任委员韩守一。1969年1月10日，辽宁省革委会同意辽南、营口合并后的营口市革委会由要清川任主任。¹

（十）辽南专区

1968年5月3日，经辽宁省革委会批准，成立辽南专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由原辽南专员公署专员金铎担任。12月26日辽南专区撤销，所辖各县分别划归营口市、旅大市领导。

（十一）本溪市

1967年2月，全市群众组织开始层层夺权，市级党政机关遂告瘫痪。市委个别常委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常委闹革命”。不久，全市造反派组织形成两大派，即“毛泽东思想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八三一）和“本溪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本联）。从此派性斗争益加激烈。3月26日，本溪驻军、本溪军分区成立“三支两军”办公室，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机关、学校、文化、卫生等部门。在本溪军分区领导下，成立负责指挥全市经济工作的临时领导机构——本溪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是年秋，本溪市两大派代表在北京协商大联合，至翌年初达成两派“大联合”协议。1968年6月15日，经辽宁省革委会批准，本溪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军代表胡金波任主任。²

（十二）盘锦垦区

1967年2月3日，中共盘锦垦区委员会、垦区人委被夺权，区委、区人委领导机关陷

¹ 《营口市志》第一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页184-189。韩守一，时任陆军第一一五师政委。要清川，时任陆军第三十九军参谋长。

² 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本溪市志》（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10月版，页69-70。胡金波，时任陆军第六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

入瘫痪状态。是月，垦区相继成立各种战斗队、兵团、纵队等造反派组织达 900 多个，对垦区党委第一书记马赋广、第二书记李世善、副区长许宏文等轮番批斗。群众组织尖锐对立，派性斗争逐步升级，武斗流血事件经常发生。3 月 5 日，解放军 3125 部队到垦区开展“三支两军”。1968 年 1 月，垦区“大联筹”与“五一六”两派在北京达成大联合协议。2 月，垦区公、检、法军管会成立。6 月 28 日，经辽宁省革委会批准，盘锦垦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刘盛田兼。¹

（十三）辽阳市

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辽阳市委机关各群众组织联合，于 13 时宣布“正式夺了市委的大权”。同日，“一二·六革命造反总部”、“辽阳市无产阶级造反团”联合“大夺权”，先后夺走中共辽阳市委、市人委、市公安局、法院、检察院、报社、车站等机关单位公章。1 月末到 2 月初，市、县其他群众组织也纷纷大搞“夺权”。7 月，市、县各派群众组织相继武装，武斗日渐升级，打、砸、抢事件不断发生。1968 年 1 月 28 日，辽阳市 4 个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议书。8 月 2 日，经辽宁省革委会批准，成立辽阳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得功。²

（十四）旅大市

1967 年 1 月 23 日，旅大警备区奉命到地方“支左”，陆续向市级党政机关、报社、电台、大型厂矿企业、高等院校等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 月 1 日，全市 42 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开会宣布夺市委、市人委权。市党政领导机关瘫痪，全市陷于无政府状态。2 月 8 日，驻旅大部队奉命强行解散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瓦纺工人造反团”。11 日，又强行解散“旅大造反军团”。从此，旅大群众组织围绕对解放军“支左”的态度和行动问题，分成“拥军派”和“反军派”。3 月 28 日，旅大警备区等根据中央指示，对旅大实行军事管制。8 月 24 日，在大连卫生学校发生严重武斗事件。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动用枪炮

¹ 盘锦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盘锦市志》综合卷，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年 1 月版，页 89-93。3125 部队为陆军第一一七师的代号。刘盛田，原任营口县委副书记兼水源公社党委书记，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

² 辽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阳市志（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 月版，页 111-113。李得功、时任炮兵第十一师师长。

等武器，造成1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从1966年末至1968年上半年，全市发生大小武斗事件76起，死亡189人，重伤625人。1968年1月30日，旅大市三大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签署《旅大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3月7日，该《协议书》正式公布，并成立旅大市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8月3日，辽宁省革委会下发《关于成立旅大市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同意成立旅大市革命委员会，邓岳为革委会主任。¹

（十五）抚顺市

1967年1月24日，抚顺市一派群众组织夺了《抚顺日报》社和市公安局的领导权。2月23日，另一派群众组织又从夺权的群众组织手中夺了市公安局和《抚顺日报》社的权。从此，抚顺市的造反派分化成为两大派群众组织。3月，抚顺军分区和驻抚部队开始介入抚顺市的文革运动。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处办公楼被群众组织占领。从此以后，抚顺市的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相继被迫停止工作。5月23日，在抚顺军分区主持下，成立“辽宁省抚顺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1968年1月12日改称“抚顺驻军生产指挥部”）。这个指挥部由军队干部牵头，吸收群众组织代表及部分领导干部参加，实际上取代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成为抚顺生产、工作的临时领导机构。1968年7月15日，抚顺胜利矿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武斗，有18人丧生。从1967年7月中旬开始武斗以来至本日，全市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打、砸、抢”和武斗事件300多起。其中大型武斗有40多起，动用了机枪、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全市因武斗死亡700多人，伤1,700多人，重伤致残240多人。8月28日，抚顺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在南站广场召开，市革委会主任张怀瑞在会上讲话。²

以上15个地、市级革委会，其中旅大警备区、军区工程兵、军区炮兵、空二军任第一把手的各1个，各占6.7%，共占26.8%；陆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六十四军各2个，各占13.3%，共占39.9%；省军区系统3个，占20%；地方干部2个，占13.3%。

¹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大连市志·大事记·行政建置志》，大连：大连出版社，2001年4月版，页155-158。邓岳，时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

² 抚顺市地方志办公室：《抚顺市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页114-115。张怀瑞，时任陆军第六十四军副军长。

【综述】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概述（节录）

——黑龙江、吉林、辽宁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启之

黑龙江

一、史志、大事记

与某些省比起来，黑龙江党研室的成果相当可观，他们不但出了省级的中共历史和大事记，如《中共黑龙江简史》（1923—2003）（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中共黑龙江历史青少年读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98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还出了不少地市级的党史和大事记。¹

但是，就与文革有关的成果而言，黑龙江的党史远不如方志，这主要表现在内容的深广上，黑龙江的方志，不仅出到了地市这一级，如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佳木斯等，而且深入到了地市下面的区县。以哈尔滨为例，哈市下面有七个区，从哈市，到这七个区的方志，其中有五个区的方志中有大事记。在记载文革方面，这些大事记在记载文革时，有的写得笼统简括，有的则相当详细。举三个例子：

1. 《太平区志》大事记，1968年10月25日：“太平区发生一起‘红旗轿车’事件。潘复生女儿闲游乘坐的红旗轿车因没有合格证，被太平交警中队干警郭东山及执勤民兵截住。事后，市军管会根据韩潮指示，将郭打成现行反革命，非法拘留审查31天。”

2. 《道外区》大事记，1971年11月18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4410件，已查证核实1488件，占33.6%，破获政治、刑事案件473

¹ 如：《中共齐齐哈尔地方党史大事记》（上册1919年5月—1949年9月）（中册1949年10月—1966年4月）内部印刷，1987；《中共大庆历史》中共党史，2008；《中共大庆历史大事记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中共牡丹江市党的历史活动大事记》（1920--1986）（内部印刷，1988）；《中共佳木斯市党的活动大事记》（1928-1987）内部印刷，1988年等。

起，其中大案、要案、集团案 78 起。” 1979 年 2 月 10 日：“中共道外区委、中共哈尔滨市第二轻工业局委员会作出关于 1968、1969 年东方锅炉厂两起‘反革命右倾翻案集团’案件彻底平反决定。强加于受害者和受牵连的人一切罪名和不实之词一律推倒。” 6 月 30 日：“全区揭批查运动结束，共发现冤假错案 1 237 人，其中致死 62 人，致残 38 人，错押 74 人，遣送 64 人，抄家 39 人，揪斗和隔离 933 人，其它 27 人。……对于制造冤假错案，挟嫌报复，迫害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的打砸抢分子和犯有严重打砸抢错误的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教养 6 人，受党纪和行政处分 13 人。”

3. 《平房区志》大事记，1968 年 4 月 23 日：“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将平房公社平房屯出现的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派性斗争问题，认定为‘反革命阶级报复’事件，召开万人大会，大抓‘反革命分子’，共有 50 多人被捕、被关押，其中 3 名被判处死缓，4 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因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未执行)，时称‘平房屯事件’(4·23 事件)。”

哈尔滨市下面有 12 个县，这个县都有自己县志。而绝大多数县志中，都有大事记。在记载文革方面，有的相当详细，再举三例：

1. 《双城县志》大事记，1966 年 6 月：“县委将全县 3000 余名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城内第二中学、第三中学进行集训。在 40 天的集训中，中小学校领导干和一般教师有 2459 名被点名批判。” 7 月 5 日“以兆中、二中、三中等学校为主的红卫兵，在县体育场召开炮打县委司令部“点火”大会。给县领导干部打花脸，进行揪斗批判。” 9 月“县政府办公室干部张凤山等 5 人，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影响秋收生产的情况，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向全国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暂停两个月的规定。” 12 月“哈尔滨电工学院‘造反团’派人来双，又一次进行‘点火’，城乡各部门、各单位相继成立造反组织。……”

2. 《巴彦县志》大事记，1966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县普遍开始。仅有文字记载的“造反派”组织就有 499 个。” 8 月 28 日：“兴隆中学”红卫兵“联合各界”造反派”350 余人，分乘 8 台汽车，

押着原校领导及教师 10 多人到县城进行所谓的“革命串联”，造县委的反。毁坏了县委、县人委机关内的桌椅、沙发、台灯、卷柜等用品。” 12 月：“在全县各地墙上和房山头用红、黄、白诸色油漆涂写毛主席语录，名曰“红海洋”，仅县城各单位用于购买油漆款达 30 余万元。” 1968 年 3 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出现了三起较大的冤假错案，一为“清真寺”，反革命集团；一为兴旺大队“拉马分队”事件，一为丰乐公社志达一队“扶蒋反共暴动委员会”事件。株连了一大批人，使一些人蒙受不白之冤。”

3. 《依兰县志》大事记，1972 年 5 月 8 日：“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依兰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依兰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错把一批干部认定为‘依兰县潜伏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成员，以代号‘113’立专案清查。经审问调查，根本无此组织，纯属假案。由上两组织负责给受触动、牵连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除了大事记，这些方志中还藏着很有价值的内容。如《方正县志》第八编 政权/政事，第四章 公安司法，第三节 审判：“1968 年 11 月公、检、法被砸烂，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原法院干部集中办学习班。法院工作由军管组代替，由于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受‘左’的错误干扰，审判工作混乱，刑事、民事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并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1980 年法院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审理的案件，复查了 426 件，其中平反纠正了 48 起冤、假、错案，使 52 人从被迫害中解放出来。”《五常县志》第十五编 政法，第二章 检察，第二节 审判：“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民事诉讼案件曾一度由军事管制小组审理，工作人员不懂法，业务不熟，致使审理的刑、民诉讼案件出现许多错案。大量民事诉讼案件长期积压，无人审理。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和‘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的原则，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审理的 1159 起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复查后，共平反纠正了 170 起，182 人，赔偿经济损失 10 万余元。对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也均按上述原则进行了复查。其中平反纠正了原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案件 24 起，24 人。”

此外，一些涉及到文革的单位史也值得关注，如：《齐齐哈尔轻工院校史》（1952-1985）（中国轻工业，1992），《齐齐哈尔市第二中学校史》（1951-1991）（内部资料，1991）

二、学术研究

关于黑龙江文革的学术文章，无论是官方文人，还是独立学者，都鲜有涉猎。就笔者视力所及，只有王永魁《“文化大革命”初期夺权的动态变化》，徐金洲《1969年开始的全军临战状态何时结束——兼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与临战状态的关系》，以及王锐《毛远新文革早期的三张大字报解读》等寥寥可数的几篇。

三、回忆、述往

在回忆录、传记方面，当年黑龙江的领导留下来的，有《李范五回忆录》（中央文献，2012）、《欧阳钦传略》、《王一伦传》（黑龙江人民，2009）、《李剑白回忆录》（黑龙江人民，2008）和《心系财贸，解惑求真——关舟回忆录》（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主政黑龙江多年的潘复生，既无回忆录，也没传记。只有《文革狂人潘复生》（又名《潘复生在文革中的一些作为》）《潘复生晚年一席谈》以及《父亲潘复生在文革中的几件大事》等文章。

民间的回忆、纪实等著述，比较重要的有——

1. 范正美《秋梦追思》（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本书作者原为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教系的大学生，文革造反，成为该校红色造反团总部的负责人，黑龙江造反组织“捍联总”负责人。省革委会常委，先后担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十大代表。1984年整党期间定为“三种人”，撤职并开除党籍。后到电大经济系任教，1992年晋升教授。全书共十章，第二章（旌悬院校）至第七章（熔炉断裂）讲述了文革中事。书后附有文革大事年表和作者年表。

2. 滕叙尧《哈军工传》（湖南科技，2006）此书分上中下三卷，中卷第七十章至第八十章写的是黑龙江文革的哈军工，其中哈军工的造反多有着墨。作者另有《哈军工红卫兵

历史典故之一——“剃鬼头”的细节》、《哈军工红卫兵历史典故之二——“斗和尚”的细节》和《欧阳湘之死》(欧阳湘是原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的儿子)等文。

3.《哈军工文革回忆》作者文革时是哈尔滨育红学校的二年级小学生,其父是哈军工的教师。此文讲述了他家在文革中的被抄家,父母、姥姥被批斗的往事。其中提到了林彪的女儿林晓霖。谷丽娟《文革中黑龙江的红卫兵运动》(《龙江党史》1990/2),此文作者现为东北林业大学教师。

4.晋至冀《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求学的岁月(1964—1970)》,作者是该校的学生,从齐齐哈尔市发改委退休。全书20章,第14章至22章是文革部分。

5.冷建华《我的大学:哈军工》,作者是1962年从江苏农村考入哈军工,此文共13章,7-13章记述了哈工军的文革。

6.康有山《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作者是黑龙江大学63级学生,文章记述了哈尔滨市的两派斗争。

7.梦明《那一年我十八岁——我的文革回忆》此文作者当时是高一学生。

8.张鸣《五七中学纪事》,作者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五七中学的学生。

吉 林

一、史志、大事记

在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成果中,有两本与文革有关的内部资料,值得一提。其一是1990年问世的《中共吉林省委活动大事记》(1966--1987),此书的版权页上有四个黑体字“内部使用”,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XXXX号”。此书的文革部分,从1966年5月开始,以月为单位,逐日记录,直至1976年12月。其缺点是对基层的记载不多,对省委活动的记载较详。如,与辽宁张志新案齐名的史云峰案,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6年12月1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审批案件,会议讨论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判处史云峰(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共青团员,1974年

10月26日，经投寄传单、张贴标语等方式，反对‘四人帮’，为刘少奇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鸣不平）‘现行反革命罪’死刑案。会议错误地认定史云峰为‘现行反革命’，同意判处死型。1976年12月19日，史云峰同志被杀害。”（页209）。

其二是《中共吉林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下册，书封左上角印着：内部资料，征求意见稿，编号XX，但无出版时间）。此书分为四编，下册第三编以“文化革命的内乱和吉林人民的抗争”为题，用了五章（16—20章）140余页讲述吉林的文革。书后附有一个很符合“宜粗不宜细”原则的“大事年表”。如，大事记在1967年6月15日下面，只有“长春市发生‘六一五冲击公安局事件’。”这简单的一句话，没有说明什么人冲击，更没有说明为什么冲击。，且书中也未提到这一事件。

能够看出文革的地方特色的，是某些市县级党史。如松原党史的编写者在叙述“斗批改”时，就谈到了当地特有的“三挂”问题：“在‘清队’、整党建党和‘一打三反’运动中，一大批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除了个别的结案外，还有一些人的问题没有及时进行处理、结案，被挂起来了。至1971年2月初，仅扶余县挂起来的就有2173人，落实政策的任务十分繁重。……有的因问题没有搞清楚挂着；有的问题虽然搞清，但没有定性；有的虽然定了性，结了案，但未经主管部门批准，被挂起来的大多数是好人。”¹

在吉林省的方志中，89卷的《吉林省志》（吉林文史，1996）中的第二卷是“大事记”，其中记载了文革。吉林省下辖一个副省级市（长春），七个地级市（吉林、四平、通化、白山、辽源、白城、松原）和一个自治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它们都出了本地区的方志。²

对于文革研究来说，这些方志颇似“鸡肋”。以《长春市志》为例。加上“总志”，这部副省级城市的志书共有77卷，遗憾的是，它没有为“大事记”单设一卷。长春市下辖

¹ 中共松原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松原历史：1949--1978》第二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页329。

² 《四平市志》上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通化市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白山市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辽源市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白城地区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松原市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上下卷，中华书局，1996。

的六个区，只有南关区有包括文革在内的区志。¹余下的五个区（朝阳、二道、宽城、绿园、双阳）的区志，都是从八十年代写起。在长春市下辖的四个市县中，只有榆树县志包括了文革时期，《德惠县志》和《农安县志》虽然也是内部印刷，但都是从1980年代写起；而九台县则没有修志。在这个庞大的方志群中，唯一可宝贵的是《榆树县委大事记》（1949—1985）。这是1986年内部印刷的资料，当时政治宽松，距离文革结束只有八年，故其所记详实可观。

二、回忆、述往

吉林省委的领导人，从省委书记赵林，到省革委会主任王维湘，都没有个人的回忆录和传记问世。领导层中的两个文人，省委书记处书记郑季翘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留下的文字不少。郑有两种传记——锦松、冯宝兴合写的《郑季翘传》（吉林人民，1992）和华迦写的《郑季翘传》（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出版，2012）。宋没有回忆录和传记，但很有一些纪念他的文章，如《宋振庭与吉林省文教事业》、《无悔的人生——宋振庭同志二三事》、《一代士人宋振庭》、《“七尺从天大唱归”——回忆宋振庭同志》等。关于王维湘少将的文字，多是评论性的，如《王淮湘双手沾满鲜血》、《王淮湘主政时期的丑事》等等。被人们纪念的军队干部，大概只有洪学智，王永君、张士文合写的《蒙冤受屈十八年 红梅傲雪志愈坚——洪学智在吉林省工作生活追记》记述了洪贬黜吉林18年的经历。

民间关于文革的回忆，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文革初期的造反，二是文革两派的武斗。作者多为中学老三届和大学老五届。较重要的有：

1. 《逝水年华——长春文革记事》，作者时为长春市四十三中的初一学生，此文是他的在博客上连载的回忆录，全书共65节，从第17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至第65节“一帮一，一对红”写的是文革时期的故事。

2. 胡显中《劫后余生惊回首》（自印书，2010）²作者原为吉林大学的学生，因同情胡

¹ 《南关区志》（1949—1989）吉林省文史，1993年，全书共24篇、110章，291节，50余万字。

² 2008年，此书曾以《阳谋下的人生》的书名，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出版。

风被打成右派而被捕入狱。文革爆发时，作者正在长春服刑。全书29章，第13章至23章讲述了文革期间长春监狱的情况。

3. 姜东平《文革武斗时期的真实长春》（1-5）作者时为长春市的中学生，文革记述了1967年至1968年发生在长春的几次武斗。作者还有《回忆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兄弟反党小集团”案件始末原载》等文。前一篇叙述了长春在清队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后一篇记叙了三个青年店员在文革中被打成“现反”，蒙冤13年的经历。

4. 清秋子《“牛魔王”忏悔录——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作者时为长春市吉林省实验中学初一学生。此文共35节，讲述了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长春的文革——学生响应毛的号召，给师长贴大字报、组织红卫兵、批斗老师工友、大串连、长春的工人造反、1·18夺权、支左军队的尴尬处境以及造反派的分裂和武斗等。

5. 甘地老爹《文革岁月》（1-8），作者时为初三学生，文章也讲述了长春的武斗。

6 徐飙《梦旅》，作者时为汽车厂青工，文革造反，官至省革委会常委。此书是他写的长篇纪实小说，对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有详细的描写。

7. 张锦主编《长春影事：东北卷》（民族，2011）编者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此书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和艺术家的访谈汇编。其中谈到了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

8. 李卓英、刘志远《1967 吉林长春基础楼武斗事件》此文讲述了1967年10月16日～19日，吉林长春市“八”一八野战军”及同派的“长春公社”与“红色造反军”，为争夺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楼，以建立本派武斗据点进行的武斗事件。

辽 宁

一、史志、大事记

辽宁省的中共党史只出了一卷，与文革有关的二卷至今仍付阙如。如果用《中共辽宁历史简明读本》（辽宁教育，2011）来弥补这一遗憾的话，那么，遗憾会更大——简明读

本只用了一章三节万把字就把十年文革打发了。令人欣慰的是，它有一本巨细不捐的大事记，¹几乎是逐日记载了包括沈阳军区的辽宁省各地的文革情况。如1967年9月7日：“由于不断发生武斗，造成沈阳市内断粮。沈阳部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和车辆，日夜从郊外粮库向市内运输，保证了居民口粮的正常供应。”（页253）。1968年4月13日：“鞍山市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共打死了23人，称之为‘四·一三事件’。14日，市革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这一事件时，错误地将其定为‘严重政治事件’，对一派群众650多人进行隔离审查或揪斗，一些人的家属、亲友受到株连。中共十一届全会后，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页256）。1969年1月21日：“沈阳军区专案组根据某群众组织专案组提供的所谓‘线索’，罗织了一个90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分子名单’。因涉及的人原籍都是东北的，故名为‘东北帮’。其中，有副省级以上干部12人，市、部、厅、局级的36人；全国政协委员7人，省政协委员17人；省参事室参事、文史馆馆员22人。不久，在这90人中，即有55人被‘专政’。有的被定为‘特务分子’、‘叛徒’和‘叛党投敌集团成员’、‘反革命分子’、‘叛特嫌疑分子’等。”（页267）

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大事记还记录了粮食供应、污辱教授、文艺批判，禁止农村的自由集市等社会的各个层面。1970年12月31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节约用粮的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制粮食销量，继续动员城市人口上山下乡；取消各种会议补贴和不合理的补贴粮；城市面粉供应，除外宾和伤病员外，一律改为全麦粉；高粱要加工一部分高粱面，米类均改为三等。”（页280）。1973年8月2日：“毛远新等人在沈阳医学院对56名教授、讲师搞突然袭击，用本年高考的数学试题‘考’他们，企图搞臭知识分子，吹捧交白卷的张铁生。”（页323）。1974年2月1日“辽宁省委批发了沈阳市文化局刘思铭揭发‘文艺黑线回潮’的来信，在文艺战线上点火，全省进行宣传，在全省文化部门掀起了批林批孔反击‘文艺黑线回潮’，同时对小说《生命》展开了批判。”（页333）。1975年1月5日“中共辽宁省委在彰武县哈尔套公社召开现场会议，推广所谓‘割

¹ 即由高峰主编的《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资本主义尾巴的‘哈尔套经验’。以公社为单位，赶‘社会主义大集’。这种‘社会主义大集’是强迫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必须卖给供销社，不准到集市出售，然后再从供销社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取消了政策允许的农村集市贸易……”（页349）。

辽宁省地市级党史的出版情况，参差不齐。辽宁省下辖14个地市，其中沈阳、本溪、营口、阜新、朝阳都有党史二卷，¹而大连、鞍山、抚顺、丹东、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虽无党史二卷，尚有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党史大事记。²在这些城市中，锦州似乎最有定力，在举世滔滔的修史大潮中，这个城市的党研室仅出了一部远离文革的《中共锦州地方史》（1923—1949）。那些想了解锦州文革史的人们只好把目光投向《中共锦州市委党校校史》（1948—1998）（中共锦州市委党校，1998）。

近三十年来，辽宁省的方志部门出了很多成果，与文革关系密切的，是这些志书中的大事记。《辽宁省志》中有大事记，辽宁下属的14个地市中，《沈阳市志》、《抚顺市志》、《大连市志》、《营口市志》和《辽阳市志》等在第一卷或总述的后面，也都有本市的大事记，这个大事记或详或略，都包括了文革时期。

另外，史志部门还编写过一些专题性的书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

1.《中共朝阳地方党史专题汇编》。此书在“党史征研”的标题下，将文革十年按时间顺序分成三个单元，每个单元由五个专题构成。

第一个单元（1966年516后至1969年九大前）：1.“五一六”通知的贯彻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2.文革期间的红卫兵运动，3.“全面夺权”斗争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4.文革期间“三支两军”工作，5.“工农军”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情况。

¹ 这些党史的出版情况详如下：《中国共产党沈阳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中国共产党本溪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中国共产党朝阳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中国共产党阜新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中国共产党营口历史》第二卷（1949—1978），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

² 这些大事记的出版情况详如下：《中国共产党大连历史大事记》（1919.5—2000.12）大连出版社，2001；《中国共产党鞍山地方党史大事记》（1927—1990）沈阳市美术印刷厂，1991；《中国共产党抚顺历史大事记》（1927—2004）中国国际出版，2004；《中共丹东党史大事记》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1992；《中国共产党辽阳历史大事记》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中国共产党铁岭历史大事记》（1919—2014）（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中国共产党盘锦党史大事记》（1945—2000），沈阳出版社，2003；《中国共产党葫芦岛历史大事记》（1943—2003）中共葫芦岛市委党史研究室，2004。

第二单元（1969年九大后至1973年）1. “九大”前后“左”倾路线贯彻执行情况，2.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3. “五七”干校情况，4. 历史大潮中的朝阳农学院，5. 赶“社会主义大集”及割“资本主义尾巴”情况。

第三单元（1973年至1976年）1. “批林整风”运动，2. “批林批孔”运动及其后果，3.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情况，4. “文化大革命”给朝阳地区造成的严重破坏，5. 揭批“四人帮”，清查帮派体系及清查“三种人”。

每个专题由一篇文章组成，文章引用资料均未注明出处。这15篇文章的总字数是非10万4千余字。相当于官方版的辽宁省朝阳市文革史概述。

2.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辑、整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连》（内部出版，2001）这是一本综述性的图书，收录文革专题资料《“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文革”时期的整建党工作》、《“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受迫害情况》、《“文革”时期的工业》、《“文革”时期的农业》、《“文革”时期的商业》、《“文革”时期的人防工作》等44篇，全书共32万字。

3. 铁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铁岭》（内部出版，2010）共32万字，由综述、专题、回忆录和大事记组成。综述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铁岭、昌图、开原、西丰、铁岭5部分；专题分“红卫兵运动”、武斗、整党建党、农业学大寨、知青上山下乡、“金家中学经验”、西丰县十名“革命小将”反潮流、“顶风记”出笼前后等8个专题；回忆录部分收录了孙奇等8人的回忆文章。

4. 昌图县史志办公室编：《中共昌图地方党史》第4辑文革时期1966.5-1978.12（内部出版，2011年）

二、回忆、述往

关于辽宁文革的研究，就笔者目力所及，有三篇文章应该提及：周治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朝阳农学院》、刘玲灵《文革后期辽宁省全面整顿情况始末》和张淑燕《文革时期的特殊高考：炮制“白卷英雄”始末》。而亲历者的回忆作品较多。省级领导方面有，

《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陈 1968 年入主辽宁，至 1973 年调离，十年文革，他主其半。此书是根据陈生前的口述整理而成。书的第 15 章至 16 章，讲述了他主政辽宁的经历。《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宋是东北局第一书记，文革中受到冲击。此书的下卷第十八章讲述了他文革中挨批写检查，农场劳动，以及 1974 年调回北京的经历。《永远的怀念——郭峰工作文集》（上下，辽宁人民，2007），郭峰时为辽宁省财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审查”，下放到省“五·七”干校劳动。此书提到了文革时郭的经历，收入了纪念他的文章。在当年的省级干部中，毛远新是个重要人物，关于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多有文章论及，毛也有回忆性文章，但鲜与文革有关。

民间的回忆文字，主要有：

1. 铁背山《辽宁文革二三事》此文题为辽宁，实际上写的是抚顺在文革后期（70 年代）发生的五大政治事件：王曼恬制造的《艺浪》黑画事件、“红工联”造反派领袖武振良和郭大可被镇压、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抚顺、庆“九大”天桥踩踏导致几十名女中学生伤亡以及市百货大楼被炸事件。

2. 高振河《沈阳武斗与军区支左的关系》此文讲述了 1967 年 6 月和 8 月沈阳发生的两次武斗事件，第一次是辽革站与辽联之间的武斗，史称“六一事件”。第二次是“辽革站”在机场袭击赴北京开会的代表，打破飞机两架，打死打伤解放战士多名。作者揭示了沈阳军区在两派争斗中扮演的角色。

3. 李德起《忆沈阳军区机关文革运动》，作者时为沈阳军区司令部军务部的干部，此文记述了文革之初军区的造反。

4. 《我所经历的文革往事》（1--14）作者时为锦州某地农村的小学生，此文记述了 1966 年至 1980 年间的农村政治。文革中暴力、学校的混乱、黑五类受歧视等等。

5. 王紫辰《阜新的文革之灾》作者时为阜新市的小学生，此文出自作者的博客，是一篇阜新文革的简述。

6. 文青：《走过硝烟的红卫兵——锦州文革回忆录》作者时为锦州市第十二中学的红卫兵，曾多次参加过武斗并负伤流血。此文从1966年6月写起，一直写到1968年6月，对这三年的锦州文革做了较详细的描述。

7. 《J城的往事》，这是一篇锦州文革的回忆录，作者时为锦州海军学校的子弟，初中生。文章从1962年写起，重点是1966年至1968年。

8. 安海岐 《回忆“五·一六”绝食》作者时为锦州某高中的67届毕业生。文章叙述了1967年5月16日锦州部分学生和外地串联的学生一起，以要求取消《三·六通令》为由，在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迫使市公安局军管会十天后撤消《三·六通令》的事情。

9 齐占文《沧桑回眸》（自印，2007）作者时为中共锦州市铁合金厂党委书记。此书讲述了他所在单位的文革，以及他本人受到的迫害。

10. 有两本右派写的回忆录值得一提：第一本是倪艮山写的《沉思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作者原为国家经委干部，时为辽宁新邱煤矿监督劳动的“摘帽右派”。此书是他的回忆录，讲述了文革中的新邱煤矿，以及作者的遭遇。另一本是张今写的《难忘的岁月》（辽源文史委员会，2011），此书又名《右派，在太子河畔——本溪劳动教养院回忆》，作者时为一补划右派，此书是他晚年的回忆录，讲述了政治贱民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其中涉及到本溪的文革。

【综述】

黑龙江省文革史资料补充

杜钧福

1. 综述

最早的关于黑龙江省文革的叙述可能是谷丽娟《黑龙江省的红卫兵运动》（《龙江党史》1990年第2期）。

李义军是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史专家。在他的博客里有关于黑龙江省文革的系列文章：《黑龙江动乱的前奏》、《陈雷挨打的真正原因》、《惊动周恩来的黑龙江省两派武斗》、《黑龙江省“五七干校”创建始末》、《黑龙江省的揭批查》。其中《陈雷挨打的真正原因》涉及抗联历史。

最近原黑龙江省领导人李力安发表一篇重要文章《为“潘、扬、汪”事件甄别平反及其他》（《党史博览》2016年6期）。涉及文革期间该省一些重要事件。例如潘复生倒台经过：“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潘复生未经中央批准，对汪家道和沈阳军区支左的一批军队干部进行批判。陈锡联、毛远新为此对潘复生不满，认为他打倒老干部一大批，打倒军代表一大批，打倒造反派一大批。1971年6月沈阳军区决定对潘复生免职审查，认为他被捕坐过监狱，给他定为‘叛徒’‘走资派’，党内外职务一抹到底，下放到沈阳农村劳动改造。”

2. 学校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滕叙尧《哈军工传》（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用11章内容写该校文革更为详细。该校老干部任学文也著有《哈军工》（红旗出版社，1993）和《永远的哈军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3），亦涉及文革。该校文革造反派“槐树传人”在其新浪博客中，根据自己的文革日记编写了文革回忆录，记载了从四清返校到夺权后两派斗争的历史，虽较概括，却很生动。该校学生老藤在其博客上发表《欧阳湘之死》一文，叙述前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之子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如何被迫害致死。

哈尔滨工业大学：该校1964年进校的学生“晋至冀”在凯迪社区史海钩沉中发表《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求学的岁月》，其中半数篇幅涉及文革。另有该校人员在新浪辟“哈工大十年文革史”专栏，搜集该校文革资料甚众。

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可见该校《红色造反团》一位领导人“泥瓦匠”的回忆录《我的文革经历》。该校文革有其特点，就是他们这个《红色造反团》的重要领导和骨干都是文革前的学生干部，和别的学校相反。原因是文革开始时，大部分学生都在农村参加四清，

等到他们回校的时候，造反已成气候，于是顺势参加了造反派并重建《红色造反团》，成为主要力量。夺权以后，因为原来都是学生干部，自然积极解放与他们熟悉的干部。这时引起许多出身不好的中年教师的不满，联合受他们影响的学生成立《串连会》与之对抗，形成新的两派对立局面。在社会夺权上，联合其他学校的反对派形成了炮轰派。

哈尔滨师范学院：除去范正美的《秋梦追思》书以外，中文系一位学生阎德喜也撰写了回忆录《暴风雨中的迷失》。他是一位造反派，并继而参加了炮轰派，后来做了检讨。他出身农村，所以其中不少内容反映了四清运动前后农村中的矛盾和冲突。

3. 地方

黑龙江省省会以外的地方文革史资料较缺。关于该省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市文化大革命档案》（360doc 个人图书馆）一文主要介绍该市档案馆藏文革资料。该档案馆还根据馆藏资料编写了详细的《齐齐哈尔市文化大革命十年》，但笔者至今未见。此外，原在富拉尔基的重工业学院，即现在的燕山大学的校史内亦包含一些该市的文化大革命资料。

比较齐全的地方文革史描述见于鹤岗，一座中等煤矿城市。在鹤岗网上有《十年文革》长文，作者佚名，似是一中老师或学生。一中是鹤岗的“最高学府”，像其他一些中小城市一样，一中在文革中起了领头羊的作用。

该省文革中武斗最厉害的地方除哈尔滨外，就是佳木斯、汤原等地。佳木斯有关资料较少。“宝窗闲人”博文《风雨佳木斯（我的1966-1967）》主要描述武斗事。汤原的一位当时的中学生撰写长篇回忆录《十八岁记忆里的文革》，叙述学校和社会上的派别斗争。

延寿县地方志办编写《延寿县“文化大革命”十年录》，声称“以县直机关运动发展为主线，力求记述全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面貌”“为反映事件全貌，尽量详尽地介绍事件的全过程，而避免事无巨细一一罗列。”所以叙述甚详，如1966年11月14日“柳河中学李德祥等6人徒步去北京串联，走到沈阳返回1人，其余5人继续前进。以47天的时间，12月30日到达北京。”他们这种准确记录历史的传统可能始于文革，例如1968年3月29日，“县文革办向县直各群众造反团体印发了‘战斗团队登记表’，对县直各战斗团队的

名称，成立时间，人数等进行了统计。据统计，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共有职工 3 824 人，成立 86 个战斗团队，有 1805 人参加。延中有 1509 名师生，4 个战斗团，1271 名师生参加。办公室对这些群众组织的宗旨、行动以及在运动中的表现进行认真的分析。认定有 35 个战斗团队是保守派，有 1160 人；观潮派组织 18 个，有 491 人。”所以保留资料甚全。

通河县一位青年工人李建民曾深度涉入文革运动，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和在散文网上(笔名“屡扑”)从自身角度叙述该地文革历程。可以看到由于滞后效应，地方上的运动节奏显著不同于省城。

4. 农场和兵团

这部分资料，特别是前期，基本来自官方主持编写的志书，未见民间资料，所以基层的全面情况不明。1966 年 3 月之前，黑龙江省的国营农场分属东北农垦总局（驻佳木斯）和黑龙江省农垦局。1966 年 3 月，鉴于中苏关系紧张，为加强边防，沈阳军区抽调万余名复员转业军人组建两个农垦师，分别称为农建一师，又称黑河一师，和农建二师，又称合江二师。这一时期历史可见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史志办《黑龙江农垦志》

实际上在此期间，和地方一样，也发生镇压群众事件。例如 1966 年“10 月，萝北县军川农场发生所谓破获反革命集团事件。在全场抓‘反革命’327 人。其中有 94 人被拷打、6 人致残、57 人轻伤、3 人死亡，应属大案。1967 年 2 月 10 日省公安厅、合江军分区、合江专署公安处组成‘军川专案组’，经调查宣布所谓‘军川反革命暴乱案件’纯属假案，给受害者平反。”（黑龙江农垦史志办《黑龙江兵团组建前大事记（1966-1967）》，黑龙江兵团网，2009）又如 1967 年 9 月 25 日“九三农垦局红色造反者大联合总部用了 7 天时间游斗‘走资派’及‘牛鬼蛇神’24 人。接着全局层层游斗 541 人，造成 35 人非正常死亡，7 人自杀未遂。”这股风是如何刮起来的未予交待。

萝北县宝泉岭农场的《宝泉岭农场志》中有关章节叙述了位于萝北县的该农场的文化大革命过程。这个农场的文革也是从中学开始的，并漫及整个农场，和其他地区单位的进程相似，在激烈的两派斗争中武斗死亡 8 人，其它非正常死亡 24 人。北京的清华大学等校

学生曾多次派人前去支持农场造反派。

在《龙镇农场志》中有于生江（气象站原站长）《龙镇农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见闻》一文。该农场属于劳改系统，位于黑河地区。

鉴于东北各国营农场的混乱情况和当时国际形势，中央决定建立统一的东北农业生产建设兵团。1968年6月18日，沈阳军区派遣3000名现役军人进驻到北大荒垦区，将原属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和原省农业厅所属大部分农场，连同上述两个农垦师，组建办军事化的兵团，从而进入兵团时代。从1968年到1969年，兵团接受了几十万来自各地的知青，成为兵团的主要成分。关于知青在兵团的生活有大量的回忆录，此处不赘述。

5. 其他


现有文革文献多涉及上层“路线斗争”和群众组织间的武斗。其实更应关注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方面的内容只能在一些材料中看到一鳞半爪，专门叙述的很少。

使人动容的是民间普遍的贫困。例如离哈尔滨不远的通河县，一些农民家买不起食用盐和发面用的碱，只能吃“白食”。一位省里干部于1975年下放到肇源县搞“路线教育”，发现此地普遍存在“拉帮套”现象，即一位丈夫全年劳动挣的工分养活不了全家，不得不招进第二个丈夫共同承担，恰如一头牲口驾辕不够，还需要另一头“拉帮套”。这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老百姓失去最基本的尊严，像牲口一样生活。（天涯社区《文革期间黑龙江地区的“拉帮套”现象》）

6. 纪实文学作品


1980年哈尔滨枪毙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王守信。刘宾雁就此题材写了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人民文学》1979年9期）描写这个女人在文革如何起家。此作品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批评写法不好，有人怀疑王不够死罪。但无论如何，这部作品所描写的主要内容恐怕是事实。王原是黑龙江宾县煤炭公司的业务员，文革中“造反”，在武装部杨政委的支持下打垮了对立派，入了党，当了煤建公司经理兼支部书记。此作品确实“写法不好”，品位不高，但揭示了文革后期出现的重要现象，就是地方黑恶势力的形成。

作家梁晓声纪实性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文化艺术，2006）。书中主人公是一名中学红卫兵，先是保守派八八派，后来参加了炮轰派。他分析参加炮轰派的原因时说：“‘捍联总’代表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炮轰派’代表一种不屈服的挑战意志。正因为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强大得多的，后者的挑战意志才尤其显得勇敢无畏，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炮轰派’的最终失败，几乎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义一开始就闪耀着悲剧精神。”


作家于艾平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原谅，但不能忘记》，第一部《白土地》可在网上看到。主人公的父母均在齐齐哈尔糖厂工作，父亲是当权派，主人公是糖厂附小学的学生。他说这本书：“真实地记述了中国60年代末的那一场疯狂的运动。在少年的眼中，幸福的生活秩序突然被打乱了，世界成了一座刀光剑影鲜血淋漓的战场。一夜之间爸爸妈妈变成了坏人，大哥哥大姐姐们变成了红卫兵，自己也变成了任人欺凌的狗崽子。运动中的各类人物粉墨登场，形形色色的造反派构成了红色政治最基层的主流。……人造的神像愚弄着芸芸众生，芸芸众生也嘲讽着人造的神像……作者的经历让人不寒而栗，如同一鞭戒尺，警醒后人的灵魂。”

【读者来信】

1. 郭予庆纠错：

《记忆》246期47页，陆伟国文章中写道“余立金是空军副司令”，而其时余立金为空军政委（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226页）。

2. 蒋健正误：

246期陆伟国文中的“四人帮及其小爬虫戚本禹”表述不妥，陆说的是1967年的事情，而“四人帮”形成是1974年以后的事情，而且“四人帮”中的姚文元在中央文革中的地位不如戚本禹，所以“四人帮及其小爬虫戚本禹”不如改成“中央文革”；另外，陆文中称余立金是空军副司令员，错！余是空军政委。

【2018 总目录】

2018 年总目录 (211-244 期)

2018-1-15 第 1 期总 211 期

【专稿】

启 之 重新寻找立足点——文化清理与文化重建

【重评经典】

梁幼志 《南征北战》的美化与丑化

【评论】

姜学斋 《教育叙事》：“女附中的劳动教育”浅议

乔晞华 勒庞“乌合之众论”的破产

——介绍一本批判“乌合之众论”的英文专著

【考证】

唐 燕 戚本禹的谎言——关于“撤销工作组大会”的不同叙述

【述往】

王晓林 一道难解之谜——戚本禹最后的手札

【书讯】

潘祛病 “岁月女附中丛书”：《教育叙事》和《口述春秋》问世

【文摘】

叶维丽 水滴虽微 渐盈大器——记弟弟叶维佳

【编读往来】

小鹰来信，老方有答

【资料】

《记忆》2016、2017 年总目录

2018-1-31 第2期总212期

地方文革·广西专辑（二）

【专稿】

晏乐斌 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简述

一、“三种人”、杀人犯把持广西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领导权

二、造反、武斗起家的潘玉臣的主要问题

三、广西自治区法院在“文革”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书苑】

碧琼子 《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简介

【文摘】

张雄飞 酷吏韦国清文革二三事

一、广西文革期间杀了多少人

二、笑咪咪地默许杀人

三、巧妙同意放水淹南宁

四、诬陷韦祖珍上了“林彪贼船”

五、不让路就判你十年

【资料】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广西文革大事记（1966-1976）

2018-2-15 第3期总213期

【专稿】

小 鹰 文革问答三

一、文革不是什么？

二、文革是什么？

三、文革反动了什么？

四、结 语

【子夜谭】

何與懷 必须守住真正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读 书】

乔晞华 文革暴力、分期与定义——兼谈定量分析法在文革研究中的运用

余汝信 聂元梓与安子文“特务电台发报案”

陆 凌 为历史作证——再读《平原上的歌谣》

【怀 人】

张 鸣 一个厚重的背影——哭学泰老师

【述 往】

丁东红 我的妈妈胡志涛在“八·五事件”前后

安希孟 当年逾墙偷桃，后来培植桃李——一位中学班主任的文革琐忆

【资 料】

李南央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用报告（1967年10月16日）

2018-2-28 第4期总214期

北京高校文革专辑（17）

【编者的话】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抓紧大中专院校文革史的编写

【罗文胡注】

罗征启 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二）：昙花一现八百天

——1966年10月至1968年底的清华的文革动乱

胡鹏池 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第二章评注

附件一：群友：关于“历史真实性”的讨论

附件二：胡鹏池随笔：周恩来批评四一四的两句话

附件三：胡鹏池随笔：你也有今天！

——评 1967 年 4 月 10 日蒯大富在清华“30 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发言

【述往】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二）

——扬威苏联大使馆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五）——沙洋千校

【文摘】

郭影秋 我认识的康生是个什么样

——《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节选（下）

【封面】

邹行 枯木之眼

2018-3-15 第5期总215期

【专稿】

启之 什么是“红色文化”？

【重评经典】

韋陀 《雷锋》：政治图腾与积德行善

【子夜谭】

何與懷 消灭私有制！“高级黑”抑或“高级红”？

向南雷 “红色教育”的背后——读罗治《浅谈师大女附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调查报告】

乔晞华 关于文革中民众参加群众组织调查的初步报告

【述往】

刘沂伦 困惑的革命年代

顾 媛 被热情分裂，被浩劫警醒——我在女附中的心路历程

晏乐斌 我所经历的“三查”和“土改”

【无达诂】

烏絮拉 调寄山坡羊：为主流文人画像

【文摘】

马昌海 文革前“老三届”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封面】

邹 行 波普雷锋

【读者来信】

1. 乔晞华谈王复兴之文 2. 余汝信纠小鹰文中的张霖之之误

2018-3-31 第6期总216期

纪念何方专辑（一）

【专稿】

宋以敏 何方的底色——一个老革命的反思

【读何方的书】

启 之 何方的治学与学风——浅论学者的“识”“胆”“德”

姜学斋 何方的“世纪之问”

阎长贵 史志直言昭万世——何方老对中共党史的贡献

唐 燕 我们如何成了暴力革命的信徒

——读何方《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有感

续霜红 个人崇拜为什么长盛不衰

——何方《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读书笔记

司 绛 毛泽东的误判与反日愤青的出炉

——读何方“国际形势与外交问题”有感

石名岗 也谈“何方之问”——《何方自述》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穆德冰 延安整风的文化遗产——何方谈造假与违心

【何方资料】

何方简介

学术成果

著作馆藏

2018-3-31 第7期总217期

纪念何方专辑（二）

【追思】

资中筠 又一棵大树倒下了

毛里和子（日本）悼念何方先生（附：日文信原文）

杜 光 沉痛拜别何方老

丁东 邢小群 送别何方先生

傅国涌 路在何方——深切怀念何方先生

朱 正 回忆何方先生

杜明明 泪别又一个时代的猛士——杜导正忆何方

李 昕 《党史笔记》出版的前前后后——追忆何方先生

周 实 他当然是值得纪念的

王德禄 刘志光 访问“世纪和平老人何方”

崔卫平 最后一次见何方先生

张 弘 经历迷失的何方，晚年终以董狐之笔直面历史

王晓林 追忆亲爱的何方伯伯

叶维丽 悼念何方叔叔

黄 星 追念何方

张秀君 怀念何方爷爷

张勤龙 张闻天研究的领军人物

詹志芳 忆何方伯伯

陈启懋 忆何方

茅于軾 何方是敢说真话的老干部和自由派学者

【挽文】

日本研究所 李锐/张玉珍 杜导正 贺卫方 杨继绳 周阳 日本所友人

刘德有 张森根 (台) 陈永发 (台) 余敏玲 拜怀德 何蜀 胡甫臣

马耀徽 韩效琦 李梅彬 郭健 余南南 余咏恩 胡健 周振中 姬涛

苏小玲 朱烈/兆梅 李同文/孙林 李薇 小平/娜亚 高西庆 张懿宸

陈翠玲 施燕华 瞿建中 宋明江 舒鼎/周凤仙 啟之

【挽联】

陈远 陈远焕/邓伍文 陈兵 陈世和 丁东/邢小群 丁颖 杜莉 傅国涌

郭于华 韩三洲 雷颐 何振华 何迪/王苗 贾新民 李锐 李南央 李永忠

李文子 李迺 李汝高 李仲明/谭秀英 李昕 刘火雄 刘济生 牟广丰

秦晖/金雁 商昌宝 施滨海 石高宏 苏小玲 孙承 孫國棟 王东成

王道诚 王玉成 王海光 王春瑜 王德禄/刘志光 皖兵 吴敏 謝小玲

谢健明 萧扬 徐庆全 徐友渔/崔卫平 阎长贵 余世存 曾景忠 展江

张弘 张立华 张烨 张勤龙 章立凡 章诒和 赵诚 赵锋 周为民

智效民 郑仲兵 朱海燕 香港中和 吴迪/叶冰冰

【挽诗 旧体】

冯克力 姬涛 陆纪 梁重庆 牟广丰 晓洲 周振中

【挽诗 新体】

郭世佑 木子鱼 刘红英 应约 李占柱 王晓林

【何方资料】

何方年表

学术自传

媒体报道

2018-4-15 第8期总218期

地方文革专辑（三）

目 录

编者按：纪念“新内人党”冤案平反四十周年

【专稿】

钱理群 从内蒙看文革中的民族问题

——读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

高树华、程铁军《内蒙文革风雷：一个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和图门、祝东力《康生和“内人党”冤案》

【评论】

阿尔楞 《滕海清谈“内人党”》读后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访谈】

滕海清谈“内人党”（王端阳采访 整理 阿尔楞 评注）

【述往】

陈晓庄 关于挖“内人党”的片断

【封面】

邹行 折翼

【编读往来】

1. 周家琮正误 2. 赵晖谈“红色文化”

2018-4-15 第 9 期总 219 期

【专稿】

乔晞华 从疯狂、理性到情感：社会运动学简史

【研究】

李清崑 关于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讨论

——论《矛盾论》中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倾向

印红标 升温与降温：文革期间个人崇拜的工具性运用

何與懷 个人崇拜加速度——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个历史考察

【书评】

小 鹰 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

——评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一章最后一节

【怀人】

叶维丽 陈小鲁：“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2014 年北京老三届的文革道歉与反思

【文摘】

罗点点 女学生怎样一下子变成了杀人凶手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人生观教育

周泽雄 乔治·奥威尔：带齿轮的想象和无所畏惧的理性

【封面】

邹 行 天堂之门

【读者来信】

1. 小鹰答余汝信 2. 郭世杰正误：杨忠立的籍贯不是固城县，是城固县

2018-4-30 第 10 期总 220 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十八）

【专稿】

谢甲林 聂元梓案的几大疑问

【考证】

樊能廷 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考——江青讲话的三个版本节录

附1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1967.9.1）

【1967年9月4日《北斗星》第150期 第3页】

附2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1967.9.1）

【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

附3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同志讲话（1967.9.1）

【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第630～631页，2017年】

【述往】

顾仁虎 卖大字报（外一篇：三十年后的道歉）

俞小平 永恒的真善美——在文革中欣赏西洋古典音乐

梁正路 北京街头流浪记（外一篇：北大又添冤死鬼）

【文摘】

聂元梓 我在文革的漩涡中——燕园风雨声

【资料】

聂元梓 1965年11月15日写给中央的信关于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现阶段的情况和问题

哲学系整风领导小组对聂元梓同志在去年哲学系整风和社教运动中所犯错误的意见

聂元梓同志在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的发言（1965年12月24日）

2018-4-30 第11期总221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十九）

【专稿】

谭守香 从“北大红卫兵”到“红旗飘”

蔡鸣乔 用历史的眼光评判历史事件

——我对北师大“4.26事件”的几点看法

【评论】

周家琮 胡适“史家想象力”浅释

——兼评胡鹏池“蒯大富二见吴德”的推断

樊能廷 读报小识

——评新北大公社“造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的《严正声明》

【罗文胡注】

罗征启 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三）——矛盾升级“414”高调登场

胡鹏池 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三）评注

【述往】

俞小平 我在文革中的三次“被告密”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十三）

——火烧英国代办处·批斗日共代表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六）——让人揪心的世道

【文摘】

聂元梓 我在文革漩涡中——清查“五·一六”运动

2018-5-15 第12期总222期

【专稿】

小 鹰 “官民矛盾”：从刘“四清”到毛“四清”，再到文革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二

【评论】

梁幼志 北师大女附中的阶级路线教育

——罗治《校园里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读后

安希孟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对敌斗争的哲学大纲

【考证】

余汝信 对刘志坚有关““冲击国防部事件””某些说法的质疑

【怀人】

周 馨 献给母亲的手记

【无达诂】

烏紮拉 调寄《乌夜啼》：为谀者作

【文摘】

王曾瑜 北大旧事：难忘的五年运动和学习生涯

【资料】

我们是怎么教《学习雷锋》这课书的（北师大女附中初三组）

师大女附中学校工作三年规划（草案）（1964年—1966年）

教你们真是幸福的事情——“六一”献给二五班的同学们

卞仲耘 1955年笔记《正面教育原则》

2018-5-15 第13期总223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二十）

【罗文胡注】

罗征启 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四）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是怎么回事？

绑架：1968年1月30日

先农坛，防空地下室

神秘的武斗据点

被非法刑讯逼供。

三堡疗养所的囚徒

基督山伯爵助我逃出三堡

午夜逃亡，与狼同行

总部指挥救援，回到学校

家破人亡，逃离北京

逃难到陌生的故乡（节录）

清华，我回来了

清华两派的前途——宽恕与和解必胜

胡鹏池 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回忆录》（四）评注

【资料】

附件一 丁正明、金水高：夜闯三堡

附件二 关于“护送行动”的微信讨论与相互印证

2018-5-31 第14期总224期

天津专辑 · 地方文革（四）

【专稿】

杜钧福 天津文革述略

第一章 运动初期

1. 华北局会议
2. 十六中事件
3. 几所大学的造反运动
4. 红卫兵运动
5. 破四旧

6. 三轮二社事件
7. “八二六事件”
8. 工人运动的兴起
9.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 揪叛徒
11. “万张反党集团”

第二章 从夺权到革委会成立

1. “一月风暴”时期的混乱局面
2. 二月镇反
3. “五代会”成立和两大派形成
4. 武斗

5. 中央领导接见与革委会成立
6.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

第三章 革委会成立以后

1. “二二一事件”
2. “二二一事件”解读
3. 深泽县“揪叛徒”
4. 军管下的公安局
5.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6. “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
7. 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
8. 驻军占房事件
9. 江青和小靳庄
10. 1976 年的风波

附录：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

2018-5-31 第15期总225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21）

【专稿】

李清崑 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二、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产生的根本原因

1. 社教运动前北大内部矛盾已日趋尖锐：

- （1）大搞反右派补课，多划了200多个右派分子，使人内心不满；
- （2）反右倾斗争整人既多又狠，严重扩大化，促使内部矛盾尖锐化；
- （3）批判老校长马寅初，不得人心；
- （4）瞎指挥，乱折腾，引起师生强烈不满；
- （5）在领导班子中有亲有疏，导致不团结。

2. 社教运动促使内部各种尖锐矛盾大爆发

3. “国际饭店会议”整肃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使矛盾大大激化，成为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爆发点和根本原因。

三、《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传达，是七人大字报出台的决定性条件。

【书讯】

张从 奚学瑶 郑振卿主编《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出版

张从 奚学瑶 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与反思》出版

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时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出版

唐竞 编《怀念牛辉林》出版

2018-6-15 第16期总226期

王端阳当兵日记（上）

2018-6-15 第17期总227期

王端阳当兵日记（下）

2018-6-30 第18期总228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22）

【专稿】

唐利 北大校庆120年，回忆文革武斗120天

【述往】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四）

——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七）

——不退黑材料的平反·后记

【考证】

樊能廷 “新北大公社”打压“井冈山兵团”的“千钧棒”（上）

——《新北大》关于“红旗飘、牛辉林”的评论

【文摘】

聂元梓 我在文革的漩涡中——让历史告诉未来

【资料】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关于目前形势的第二号严正声明》（1968/3/19）

聂孙之流就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新北大报》1968/3/22）

【读者来信】

赵晖谈215期“红色文化”

2018-6-30 第19期总229期

纪念顾准专辑

【编者按】

王晓林 顾准是谁？

【序与跋】

王晓林 《顾准和他的时代》自序

王晓林 《顾准和他的时代》后记

【书摘】

王晓林 了不起的流水账（选自《顾准和他的时代》第十八章第四节）

王晓林 贵州故事（选自《顾准和他的时代》尾声 第五节）

【书评】

王三义 顾准是一面镜子——读王晓林《顾准和他的时代》

陈申申 中国越来越需要顾准

【文摘】

赵园 非常年代人伦的变与常——顾准和他的儿女

钱理群 1969——1974：顾准的思考

一、读《新生日记》：

顾准的文革想象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设计

二、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对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的根本追问与反思

2018-7-15 第20期总230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23）

【专稿】

王复兴 聂元梓三次提出解散校文革考

【述往】

郭娜嘉 谁害死了北大才女

——汪静瑜“自杀”之谜

俞小平 被工宣队踢出北大之后

——山西繁峙水泥厂琐忆

郑世忠 难忘 1969

左伯莉 武斗惊魂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十五）

——逝者血泪·孙泱之死

【考证】

樊能廷 “新北大公社”打压“井冈山兵团”的“千钧棒”（下）

——《新北大》关于“红旗飘、牛辉林”的评论

【文摘】

杨 勋 北大“四清”试点

【资料】

把聂三六拿来示众——聂元梓三月六日两次汇报批注（《新北大报》1968/3/22）

2018-7-31 第 21 期总 231 期

【专稿】

小 鹰 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三

附录一 杨继绳：《天地翻覆》第 26 章最后一节

附录二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摘录及说明）

附录三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摘录及说明）

附录四 BBC 观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附录五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摘录）

【评论】

余汝信 唐平铸记录的罗瑞卿事件

何與懷 无“芯”岂能恋战？

——从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停映下架谈起

【怀人】

王晓林 君为一大事而死乎？

——再究一代船王卢作孚之死

【述往】

彭先度 老天待我不薄，夫复何求？

梁沪生 独酌翁自述——情爱篇（一）

【读者来信】

1. 刘国庆：请客座主编是个好办法
2. 崔建功：应该加强工宣队研究
3. 姜学斋：学习女附中，唤起责任感

2018-8-15 第22期总232期

毛泽东研究专辑

【专稿】

新岛淳良 著 刘燕子 译 《我的毛泽东》

序 章 毛泽东思想者十戒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其继承与发展

第二章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略）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与战争（略）

第四章 毛泽东思想集团与毛主席之死

第五章 诗人·文化英雄·愚人（略）

第六章 毛泽东思想与韩非子——二者共同的传统思维

第七章 文革究竟为何发生？

终章 我的毛泽东

后记

【读者来信】

1. 续霜红：研究“红色文化”的重要性
2. 小 鹰：不能把文革宗旨从“反走资派”偷换为“反官僚”
3. 蒋 健：余汝信之文《唐平铸记录的罗瑞卿事件》的重要价值
4. 蒋 健：小鹰之文《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有一处时间性错误

2018-8-31 第23期总233期

【专稿】

姜成洋 记忆幻觉的心理真实

——一位村干部的文革经历与事后记忆

【评论】

安希孟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对敌斗争的哲学大纲

王晓林 顾准对《自然辩证法》的追究

【重评经典】

韦 陀 钱广与雷锋——小议文革中的重拍片《青松岭》

【述往】

王 理 文革中在顺义的“八年抗战”（上）

小 鹰 文革中我参加过的“相对论批判”

【怀人】

潘泰泉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沈达力的离去

【资料】

我们是怎样教《学习雷锋》这课书的（北师大女附中初三组）

北师大女附中学校工作 1964 年—1966 年规划（草案）

卞仲耘 1955 年笔记摘录

【读者来信】

1. 任国庆：近期《记忆》小鹰的文章甚佳

2. 张建伟：扩大研究领域，重视保守派、逍遥派研究

2018-9-15 第 24 期总 234 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24）

【专稿】

夏剑勇 高云鹏 亲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附：大字报原文）

向南雷 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分析、论证方法与文风

姜学斋 关于第一张大字报的两种观点

——“策划指使说”与“推动支持说”浅析

【评论】

宫香政 论“政治倾向性”

【述往】

蒋世信 我与北师大——开学后的“专业思想教育”（一）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胡锡奎之死（十五）

【文摘】

金宏达 “时汉人事件”始末

颜品忠 文革记忆——一个北京大学普通教师的动乱经历（第一、二章）

【资料】

时汉人 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人民日报》1966.2.10）

郭罗基 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1967.3.3）

【读者来信】

1. 邵新英：为邹行的封面设计点赞 2. 林晓：介绍一幅旧画

2018-9-30 第25期总235期

【专稿】

陆 凌 前世与今生

——读文浩的《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

【西学】

（德）文 浩（Felix Wemheuer）

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前言

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终章与结论

附：饥荒政治：毛时代中国与苏联的比较研究·目录

【序跋】

何 方 何方谈毛泽东外交·卷首语

孙国光 《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序——读韦文德回忆录有感

【怀人】

朱 正 增德兄纪念

佚 名 文革第一遗书——雷扶九校长殉难50年祭

【述往】

王 理 文革中在顺义的“八年抗战”（中）

梁沪生 独酌翁自述——情爱篇（2）

【读者来信】

1. 胡 杰：234 期的封面设计很有创意
2. 梁幼志：抄录彭丽君书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享
3. 刘敏华：《教育叙事》中的白璧微瑕

2018-10-15 第 26 期总 236 期

炎黄春秋专辑（一）

【专稿】

李南央 《炎黄春秋》的遗憾

丁 东 我在《炎黄春秋》的最后一程

【读者来信选登】

1. 胡 杨：李南央提出了一个绝大的问题
2. 陆向东：李南央为炎黄遗憾，民主派为李南央遗憾
3. 梁幼志：丁东对《炎黄春秋》历史意义总结得很准确
4. 慕南雷：李南央拒绝“帮派意识”，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5. 杜继军：李南央挑起“窝里斗”
6. 司 绛：现代报刊的两个传统
7. 皮皮侠：请问李南央老师：贵文让谁欢乐？让谁愁？
8. 乌扎拉：同情归同情，批评归批评
9. 天高云淡：读李南央的文章，想起鲁迅杂文
10. 唐壮壮：李南央让我想起孟子的一句话
11. 王曙光：请李南央注意自己的言行
12. 白 丁：李南央是炎黄精神的继承者

【资料】

王晓林整理 《炎黄春秋》1991年至2004年总目

2018-10-15 第27期总237期

【专稿】

傅 蕾 文革文化中的视听艺术

——《倾听中国文革：音乐、政治与文化延续性》读后

【评论】

启 之 《桥》：自力更生与民族主义

【书摘】

何 方 何方谈毛泽东外交(第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国际形势

【述往】

韦文德 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一)

——一个“地主崽”的一生

王 理 文革中在顺义的“八年抗战”(下)

李南央 我的俄罗斯梦

梁沪生 独酌翁自述——英国特嫌

【封面说明】

邹 行 红色五线谱

【读者来信】

1. 成 岗：《前世与今生》中关于“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解释有误
2. 皮皮侠：为文浩之书叫好，为陆凌之文点赞

2018-10-31 第28期总238期

炎黄春秋专辑(二)

【专稿】

吴 思 《炎黄春秋》：重构毛泽东时代的公共记忆

王晓林 我所知道的《炎黄春秋》最后一任主编徐庆全

——兼评周磨磨的《〈炎黄春秋〉二十五年史话》

【文摘】

周磨磨 《炎黄春秋》二十五年史话

【来信选登】

1. 李 杰：读吴思文有感
2. 周立新：不是内斗，不是私人恩怨，是用人的问题
3. 风石堰：知识分子的反思和知行合一仍需进行
4. 炽 之：徐庆全“代领”了我的稿费
5. 周七月：我父亲告诉我，徐庆全借资料不还
6. 老 鬼：危急关头不可能来得及民主讨论
7. 严 诚：王晓林之文让我惊诧不已
8. 王克明：南央文章反映出的是民主思考的成熟
9. 梦 迪：感谢王晓林编出《炎黄春秋》的目录索引

【资料】

王晓林整理 《炎黄春秋》2005—2010 总目

2018-10-31 第29期总239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25）

【专稿】

赵建文 往事有据可查——关于“007密令”的《调查报告》

附录一：文革中“007”密令事件（胡宗式）

附录二：“〇〇七密令”案件：保周还是反周？（赵建文）

附录三：“除隐患”战斗队的工作（聂元梓）

附录四：2018 年 10 月北大校友在微信群中的讨论（王复兴整理）

张 比 清华大学的文革历史：研究与写作的现状与展望

【评论】

舒 声 军宣队成员怎样看北大文革

王复兴 朱成昭：一个应该载入文革历史的重要名字

【述往】

杨海峰 五年求学一场梦——我的北大经历

蒋世信 我与北师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

——阚玉瑶之死（十六）

【封面】

邹 行 前进地后退

【资料】

周培源 1967 年 6 月 16 日晚在新北大北京公社、红旗飘、革造总部举行的“彻底批判校文革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2018-11-15 第 30 期总 240 期

【专稿】

阎长贵 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何 方 共和国成立初期外交上的两条路线

【何與懷評論】

1. 个人崇拜：要么坚决制止，要么加速度疯涨

2. 他是在以牙还牙吗？

——一个中国通已经开始但远未完结的故事

3. 《致命中国》对中国相当“致命”

【随笔】

周 实 那个时候写的诗

李南央 在美国看西洋景

梁沪生 独酌翁杂忆——亲睹李劫夫/感受山雨欲来

【述往】

韦文德 一个地主崽的一生（二）

——“四类分子”·市管会主任·贫协主席

【文摘】

何 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附：一、和陈启懋的通信

二、关于两场革命——同台湾学者钱永祥谈话的提纲

三、和许良英的通讯

2018-11-30 第31期总241期

地方文革专辑（五）

【专稿】

周孜仁 云南文革史稿·导言

张业赏 “二三夺权”后山东师范学院的文革

【书评】

黄玉梅 关于《柳铁文革大事件》中三件大事的补正

石名岗 高屋建瓴的五个问题——《平定县里不平定》前言读后

【口述】

樊建政 整理 余子道、苏松柏口述

——“一步三回头”：我和朱永嘉一起去造反

【人物】

杜莲子 齐晋华先生印象

【综述】

啟 之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概述（节录）

——云南、山西、山东的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杜钧福 山西文革研究资料小识

——《地方文革研究资料管窥·山西部分》补遗

杜钧福 山东文革研究资料小识

——《地方文革研究资料管窥·山东部分》补遗

【封面】

邹 行 集叶成环，喻之为冠

2018-12-15 第 32 期总 242 期

纪念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专辑

【专稿】

唐 燕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随想

——为上山下乡运动 50 周年而作

孙佳雯 知青出身的政治变迁及其社会功能

——“红五类”、“黑五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偏差”

【评论】

慰 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

何與懷 也谈那场“知青运动”——从长诗《理想之歌》说起

【怀人】

郑 义 怀念甘铁生

鲍国芳 许晓鸣 我们的同学闻佳

【书评】

马昌海 知青的贡献与收获——读冯同庆的长篇小说《敕勒川年华》

【书讯】

刘豫徽 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敕勒川年华》问世

【资料】

易海涛 资料·内容·理论方法

——中国知青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2018-12-31 第33期总243期

【编者按】

人亡政息，文化仍在

【红色文化研究】

李 洁 发现中国的红色遗产

——《中国的红色遗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来世》导言

【红色文化译介】

度关山 李海燕的红色遗产研究

——《毛泽东的两个身体：关于扮演伟大舵手的奇特艺术》

【红色文化解读】

王克明 联合体里的“自由”是集体主义能力——重读《共产党宣言》

啟 之 红与黑：毛泽东时代的新文化——电影中的正反人物

【书摘】

何 方 毛泽东的外交指导思想（一）

【何與懷评论】

1. “碰瓷”（Peng C）：这个“专利”不光彩
2. 如此国师：胡鞍钢成了众矢之的
3. “川普现象”与“历史的钟摆”

【述往】

韦文德 一个地主崽的一生（三）——儿女的求学与父亲的药担

梁沪生 独酌翁杂忆——右派分子老王头·头号走资派

2018-12-31 第34期总244期

炎黄春秋专辑（三）

【编者按】

众生平等，百家争鸣

【专稿】

洪振快 “炎黄规则”的得与失

——兼论精英德性与对自由派的反思

杨继绳 对《炎黄春秋》的一些回忆

——兼谈李南央女士的《〈炎黄春秋〉的遗憾》

附一：我对强行收编《炎黄春秋》的态度

附二：离开《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时的两封公开信

杜 星 几点澄清——给李南央的信

李南央 回答读者提出的三个问题

王晓林 民主派需要更坚实的道德支撑——兼谈徐庆全的经济问题


【评论】

- 杨利川 中国需要一种“文化”的蜕变
- 向胡杨 《炎黄春秋》与碎片时代——茶杯里的风波
- 王智仁 长歌当哭祭“炎黄”——我和《炎黄春秋》
- 尹曙生 我读《〈炎黄春秋〉的遗憾》
- 凌 铭 这一堂课上得好！
- 吴 萍 读李南央《〈炎黄春秋〉的遗憾》想到的
- 刘 滢 三叹《炎黄春秋》——读晓林君文章有感

【来信选登】

江夫、叶维丽、蔡新平、许有为、薛原、王津津、国庆、马昌海等。

【资料】

王晓林整理 《炎黄春秋》2011—2016/7 总目录 

【本刊聲明】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